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7月31日第10期 总第18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8期

纪念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专辑（三）

【专稿】

| | |
|-------------------------|----|
| 潘袪病 看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子——以戴煌为例 | 2 |
| 附录一：“一起听讲座”微信网友同期提问 | 18 |
| 附录二：简答网友（节选） | 23 |
| 为伟 晋京 怀瑜握瑾 正道直行——追忆先父戴煌 | 26 |
| 启之 戴煌和他的时代（附：追悼会挽词） | 42 |

【戴煌遗作·评论】

| | |
|---------------------|----|
| 戴煌 我应终生牢记这两种人 | 56 |
| 戴煌 我所遇到的“阶级斗争” | 63 |
| 戴煌 我为何常常赞念这两句话 | 67 |
| 戴煌 蒋介石解决陆铿的问题及引发的联想 | 72 |

【戴煌遗作·述往】

| | |
|-----------------|----|
| 戴煌 检讨我参加的“肃反”工作 | 76 |
|-----------------|----|

【戴煌笔记 日记】

| | |
|-------------------------|-----|
| 1957年6月22日至7月6日戴煌部分工作笔记 | 78 |
| 戴煌 1957年秋冬至1958年冬春日记 | 101 |

【资料】

| | |
|---------------------------------------|-----|
| 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一封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 110 |
| 1957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 115 |
| 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两个文件手抄记录（第11号、第55号） | |

【本刊声明】

【专稿】

看革命如何吃掉自己的儿子¹

——以戴煌为例

潘祛病

关于“革命吃掉自己儿子”的话题，李慎之先生的后人，曾以《被革命吃掉的儿子》为题，编纂过他的文集；戴煌也曾以《哀炳泉兄之惨殁，索革命食子之根》为题，纪念文革中惨死的新华社同事李炳泉。李慎之、戴煌都是革命的儿子，但在中共建政后八年，都不幸被党吃掉廿多年大好年华。对此，留给他们这一代人的感受思考，值得后人回味探究。

一、关于反右运动的话题

反右运动迄今 60 年，除去前 23 年光阴，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戴罪之身备受身心煎熬之外，之后将近 40 年，反右运动一直是民间现代史研究挥之不去的重要话题。对于这场运动本身和它的后遗症，大致曾围绕以下几个话题展开过探讨。

1. 反右运动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运动

对反右运动，现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阳谋”、“引蛇出洞”或者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非理性权力欲望，铸就了这场政治运动。

这些在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丁抒的《阳谋》中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中共建政后对知识分子的整肃，1957 年这场政治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自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被动缄默长达 20 多年。

2. 右派的苦难历程是反右运动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¹ 此文根据潘祛病 2017 年 6 月 21 日晚 9 时在“一起听讲座”微信群中的同题讲座整理而成。

反右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右派遭受的苦难。这是迄今为止，被人们了解最多，感受最深的部分。仅大众传播方式，就有电影《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等，前两三年又有一部《归来》，当然没有公映的不包括在内。这些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使人们部分地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直观后果——苦难。毕竟苦难是最容易理解和记忆的部分。这半年来，艾晓明教授的夹边沟纪录片更是在知识分子群中引起关注。

3. 右派言论的记述整理

在很多文字作品中，论文、回忆录，或者资料汇集，多绕不开当年的右派言论。这之中有当年反右运动中被断章取义汇编成册的供批判用的历史资料，也有右派问题被“改正”后，人们重新整理，或完整或部分呈现的右派言论。这些言论大致可分类为，民主党派言论，文艺界演员、作家言论，高校教师、科技工作者言论，国家意识形态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记者的言论，高校学生言论等等。对这些言论和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归类分析，或做系统思想文化梳理的，至今寥寥。

4. 1957 年知识分子个体如何成为右派的细节非常模糊

1957 年，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被制造成右派的细节非常模糊。主要有现代的和历史的两个原因造成：

①现代原因：

官方对涉及现代史题材所有作品，都规定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且报审程序复杂繁琐。对不符合政党历史观的作品基本采取回避态度，甚至粗暴地强令禁止出版或公映，导致这种题材作品面世非常困难。如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运动题材的各类作品，如果要出版纸媒书籍出影视作品，都规定有繁复的报审程序。

象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该书 1990 年代曾在大陆出版，之后经历数次审批再版。但 2005 年再版时，却突然被新闻出版署叫停，原因不详。¹

田壮壮导演的反右斗争题材电影《蓝风筝》，曾在日本电影节荣获过大奖，但在国内

¹此事发生后，戴煌欲与新闻出版署打官司，代理律师张思之、浦志强。诉状递到法院 7 天后，通知此案不被受理。

却不准许公映。

同类事情，此起彼伏，导致后代人，特别是现在大学、中学的学生不了解几十年前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历史的认知，随着年代推移，越来越模糊。

其实对60年前的反右运动，30年前就有知识分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新华社记者戴煌和《新观察》的总编戈扬，三人商议准备出版一本1957年各单位如何整肃右派为内容的书，给一些右派分子发信约稿，要求他们写出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他们在约稿信中强调，每个人只写1957年被批判和处理的细节，不要写后来经历的苦难，三五千字即可。很快，全国各地的改正右派纷纷来稿（那时候，他们这些人大多五十到七十岁的样子，还都能写）。但是，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几个月后，此事无疾而终！¹

这实际上是当年的右派精英们意识到，在运动中被整肃的过程，比起苦难，有更深重的历史意义。他们感受到政治运动的切肤之痛，意识到这段反右历史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深刻意义。

这几十年，如何给一个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已经有了很多政治笑话，以致后来人们竟把这种笑话几乎当成真事，认为一个人被打成右派很可能是“点儿背”，或偶然。电影《蓝风筝》就是这样呈现反右运动的。影片中一个单位开会揪右派，与会人静默长久，谁也不开口得罪人，这时一个人憋不住尿，出去了，结果他回来后，就成了右派。电影里另一个故事，一个县政府打出14名右派，领导委派一名信得过的干部带队送这些人去劳改场所，到了目的地，按名单一点，你县应该有15名，结果带队者被强行留下，戴上右派帽子。

1957年反右是很严肃的政治运动，各单位领导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抓右派指标，胡来、凑数，或者把平时与领导关系不好的干部打成右派的情况肯定有，而且不少，否则也不会

¹ 该出版筹划胎死腹中后，戴煌曾与人谈及此事：费孝通将约稿信上呈邓小平后，出书被紧急叫停。戴煌晚年曾几次感叹该事，说现在的“他们”就像于光远说的那样，不再跟以前一样搞“文牍主义”了，下达禁令都不再行文，以免被抓把柄。

出现四川打出一个12岁“右童”这样荒诞的事情。但是，一个政治运动产生那么严重深远的后果，绝不是偶然、公报私仇，或者仅仅是为完成上级任务，甚或是几个笑话能概括表述的。这场运动的本质还是对知识分子的冷酷清洗。

②历史原因：

这些年来，反右运动整人细节很少呈现，其实反应出的是中国政治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回顾反右运动的文章，不难发现，截至目前，揭示反右运动的大都是当年运动的受害者或者后继学人，而少有整人者来回顾这段往事。中国人有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习惯，在政治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属下甚或亲朋好友整得七荤八素、七死八活毕竟不是什么光耀门庭的事，整人者虽得一时畅快或现实好处，但这暗室中背对背整人毕竟不是能与人道的光彩。带着这些见不得光的罪恶进棺材，是那些政治运动中胜利者通常的做法。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都是上级领导暗箱操作、同事背对背告密揭发（当然有很多人是出于各种考虑，被迫这样做）的受害者，当事人基本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构陷。所以，如果受害者没有机会读到当年的人事档案，如果不能像杜高先生那样幸运，¹在潘家园之类的市场发现自己的历史档案资料，他们至死也不会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就带了廿多年的右派帽子。

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政治运动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即政治运动中整人的细节，正随着那些已经遗失或毁灭的档案烟消云散。²但这些整人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文化现象，却早已潜移默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状态。很有可能，而且很多人目前已经体会到的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状态，就是这种政治运动浸淫人们文化思想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或未来人们思维习惯，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前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在此不做更多赘述。

¹ 杜高是文艺界知识分子，1957年成为“二流堂”右派小集团分子之一。1990年代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作家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杜高档案，并以此为名成书《杜高档案》。遂使杜高廿多年右派和劳改期间思想苦痛挣扎的历史被世人所知。

² 1979年中央曾有文件，清理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档案，将其中的不实之词，揭发批判和错误结论从档案中抽出销毁。这个做法虽一时减轻了受害者的心理负担，但实际作用却是使那些背后整人的黑材料彻底灭失，帮运动中整人者彻底去掉了心头遗患。

在反右运动中整肃知识分子通常的顺序是：一个知识分子日常积累下来的，或偶一为之的具体思想言论被有心的领导、同事甚至亲属记下。这些言论如同那些侵入人体内的病毒，一挨有合适的政治氛围，就会成为整人者有利的武器，在谋害受害者的同时，为自己扩展出光明的仕途和美好的个人生活。

其后，根据这些言论，一个知识分子被领导内定为整肃对象，再向下扩散，形成一个群体的共同认识，之后被群起攻之。这个过程中，除了受害者被公开批判，被迫检讨之外，其余更重要的，整人者积极筹备策划整人的部分或整体过程，完全没有受害者参与。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环节，稀里糊涂成为被打击对象，承受终生痛苦，甚至为此付出性命。

被整肃者成为右派过程中，有过挣扎、奋争、被迫屈服，这之中的思想活动受害者本人有清晰的记忆。这部分当年右派的书写回忆中记载已经很多了。

二、以新华社记者戴煌为例展示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细节

以戴煌为例谈他在 1957 年的遭遇，是由于他本人非常鲜明的三个特征决定的：

首先他是中共一手培养起来的“红色记者”；其次他有自己独特，不同于党文化要求的新闻理念；再次，戴煌到晚年时，并没有因为自己韶华之年的遭遇而气馁，相反，他老当益壮，退休后仍旧很有一番作为。他晚年的作为虽更接地气，更受到众多百姓的支持鼓励，但却更难见融于体制。

从 1940 年代中后期始，经历过将近十年战地新闻写作的磨砺，到 1957 年，29 岁的戴煌已成长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经验丰富的主力记者，是当时新华社比较有名的记者。

（一）戴煌如何被引蛇出洞

1. 由中央高层领导号召引发的给党提意见

1957 年 5 月的新华社总社。

这时，这里还处于整风运动大鸣大放阶段，从5月6号到月末27号，几乎一个月，社领导吴冷西在多个大小会议上鼓动鸣放：“目前整风运动放得还不够，问题提得还不深，不够尖锐；有人说要‘收’是没有根据的，要永远放下去，要养成这种民主的自由言论的风气，并且保持永远。”¹

五月，戴煌正在外交学院努力学习英文，他的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下第二个女儿。五月，他的生活，外人看来安逸舒适。

五月是美好的季节，但这个春天太短暂了。从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号召全国给党提意见，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变脸刊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击右派进攻，也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本来是响应号召帮着党整风的知识分子，还没能尽情思考，还没能提完意见，形势就急转直下，中共建政后的又一轮思想整肃——，而且是对今后社会发展产生过及其严重负面影响的整肃——反右运动，就这么开始了。

这时候戴煌并没有像党外人士那样也站出来给党提意见。梳理他晚年的口述得知，当时他认为党不过是在发动党外人士给党的“三个坏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些意见，他本人作为党员，虽然意见很多，但要严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要求党员提意见时，不能随意发言。

五天后，6月13日下午，按通知，戴煌去白纸坊造币厂礼堂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召集在京中央机关所有党支部书记召开的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成为戴煌廿一年人生苦难的发端。

戴煌曾在他的自传《九死一生》中提到过这次大会：

“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

¹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1957年5月30日。

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了到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察觉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申。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彻底！

.....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得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想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这个讲话和五天前人民日报社论形成强烈反差，但对党坚信不疑的戴煌对这种来自党的上层的矛盾的声音并没有过丝毫怀疑。他完全相信彭真的号召是党对自己同志推心置腹的表达。

当天晚上，作为支部书记的戴煌，就在外交学院外训班支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¹

.....

我对国家已有许多意见，除好的外，坏的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

¹ 引自1957年7月20日新华社机关报《前进》。

是国家矛盾的根源，……

……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就说是毛主席领导好，但缺点错误有没有呢？有的只看下面干部在检讨，没有看到中央检讨，……为什么论起缺点，只提李立三，王明？毛主席领导中央就没有检讨过自己的缺点（公开的或党内的）。

上面这段是谈对中央的看法，下面他还谈了对自己单位领导的认识：

……新华社最尖锐的矛盾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光听中央的指示，不听群众的意见。凡在业务上有创造和革新精神的同志不受重用，被领导上看不起，认为他们刺眼，反之，在领导面前拍马屁的人，四平八稳的人，说他们是好干部，（吴）冷西就喜欢后一类的干部。

在没有便利录音录像设备的年代，戴煌 2500 多字的发言，被同支部有心人认真记录下来，一个多月后，在新华社全面围剿戴煌时，这段发言作为罪证之一，一字不落地刊载在总社机关报《前进》上。¹

2. 佐证

对中央政治局领导亲自鼓动党内同志给党提意见的许诺，只是戴煌个人的回忆，有孤证之嫌。但最近一例实证，印证戴煌的回忆不虚。

最近清华大学的学生右派王铁藩老先生在回忆录《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中提到《阮铭回忆录》中讲的 1957 年 5 月 30 日去北京市委时，彭真的讲话。²

阮铭是这样说的：“一天去北京市委开会，蒋南翔、刘冰和我……到北京市委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后来彭真到了，……讲起来‘现在就怕他们不放，要请他们出来，让他们放够，不要急于反驳，同时要组织左派队伍，准备将来反击。’还说。‘明天晚上开始，每个晚上你们挑一批左派到市委这里开会，……做好反击准备。这段时间，你们校内还要

¹这不是戴煌 1957 年的全部言论。从后来揭发，以及他自己交给上级党组织的 1956 年底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万言书，这仅仅是一个“温和”的开始。

² 此文中引用的《阮铭回忆录》是转引铁藩先生回忆录《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未定稿。待找到《阮铭回忆录》后，明确此段出处页码等信息。

有意识地让那些没有放够的继续放……’ ”

那时候，国家机关上下级或同事之间，一般互称“同志”。同志的含义即高贵又郑重，党内同人更是如此。

戴煌晚年曾说过：“这种党的高级干部亲自出马来引蛇出洞，引诱自己同志给党提意见，再反过头来严厉整肃所谓“反党”错误，并把这些诚挚相信党的人打成敌人，已经完全粉碎同志这个称谓的美好含义，破坏了党员对党的基本信任。”

这就是被当年右派们体会最深的，史称“引蛇出洞”的一个真实案例。

破坏了上下级和同志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和信任关系，引发后来一系列社会上人们之间的不信任。这些政治运动的积极鼓动者，在后来的文革当中也大都尝到请君入瓮的滋味。

（二）基层支部的反右过程

1. 布置基层运动时的语言

被上级布置打右派任务时所用语言，预示了斗争的残酷性。

此时，尽管戴煌已被成功地“引蛇出洞”，但还没到定性的时候，他还是54人外训班的党支部书记，¹仍在主持反右支部会。从1957戴煌的笔记上，笔者能读出一个小的基层党支部在运动中是如何被上一级组织不断驱使，完成上传下达，推进运动不断产生涟漪式扩散效应：

从6月22日至7月6日，外训班学员进入停课搞运动的状态。²当时外训班54位学员中40名党员，14位团员。

6月底前，还是从整风到反右波澜不惊的转弯时期，外训班主要是各班按要求结合报刊上发表的民主党派右派言论谈感想、提问题。戴煌主持会议。议论范围已经被上一级党

¹ 外训班：1956年中央机关一些部委选派一批青年干部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或其它小语种。戴煌是当时住校英文学员四个班的党支部书记。

² 看来高等院校因为政治运动停课早于文革十年就存在。文化教育服从政治需要，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位。

组织确定，即如何认识民主党派大佬们对党提出的意见。也许是参与者都是党团员，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意识到自由言说的严重后果，噤若寒蝉的氛围逐渐浓起来。这时只能听到程度不同的批评之声，间或会有认识比较模糊的状态，但赞同党报上右派大佬们言论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戴煌的笔记中虽然没有记载此时他自己对反右运动的态度或者思想波动，但在大约半个月之后的《前进》报上，关于他本人此时的思想状态和言论还是水落石出，有了答案。

7月2日，星期一，这一天，戴煌的日程很满，从上午的全支部大会，到下午和晚上学院一级党组织给外训班支部布置反右工作的中层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会。

上午（7月2日上午）的大会，戴煌没有再做笔记，只是简单追记了一下上周六的情况¹

上周六下午（6月29日）支书会，中央精神是要将右派分子打得狠，打得准，（打）到投降为止。另外，对各班的右派思想要弄清楚。例如现在还有人说章（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五人不是反党，而是一时糊涂，争得很厉害。

市委通知（中央指示），坚决追查和歼灭右派分子，直到他跪下投降，使其今后再也向社会主义进攻。

以后打右派，要有具体对象，具体内容。空喊就不好了。

孟可能有现行背景，组织调查小组，秘密进行。

这段记录使用打得狠、追查、歼灭、下跪投降，组织调查小组秘密调查等词汇，火药味十足。把这些从战场上精炼出的饱含攻击和侮辱的词汇，用来对待反右座谈会中有一些所谓右倾言论的同志。戴煌晚年常感叹说“他们哪里还有丝毫对待同志的态度！”

其中那句稍微温和些的“对各班的右派思想要弄清楚”和“以后打右派，要有具体对象，具体内容。空喊就不好了。”显然是针对党支部这个反右很不得力的书记戴煌本人的。因为从他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所记录讨论内容，——都是按班级表态，没有某个个人发

¹ 引自戴煌1957年6月至9月日记、笔记。

言的特殊标记。

7月2日下午，学院党总支给党支部布置工作，继续面对面传授斗争方法：

孟发言乱，假（说假话），可轰下来，继续攻击。如果有点检讨的内容，我们也要保持士气，（等孟）说完之后，（我们要）抓住发言中的小辫子，立即上台攻（击）。来不及动员（大家时），支书（戴煌）要上前线。他交代出有关人时，我们不要转变方向（意思是让他说下去）。

注意（孟的）会外活动，如登门拜访问题。

对沈的斗争规模可考虑。另外还有十个多人，已暴露了，各支部（自行）解决。战斗中注意与党委分口联系（与上级要保持密切联系的意思）。

7月2日晚7时半，继续下午的会议：

加强保卫工作，提高警惕，一见可疑现象立即报告；搜索右派分子、思想，准备解决战斗活动问题：（具体到对某一个人的斗争）

.....

笔者在整理这些泛黄的笔记时，强烈感觉到一种青红帮哥老会大佬谋划起势时的惊悚紧张，动辄“打”、“狠”、“战斗”、“歼灭”血淋淋的斗狠词汇，再不就是“搜索”、“可疑迹象”、“注意会外活动”的特务手段，用来整治共同学习生活的同志。“搜索右派分子、（右倾）思想，准备解决”，上级对基层党支部，手把手传授整人的方法，言辞露骨，没有任何遮拦。

1957年反右运动本来是中共主动发起的，但运动开始后，主动进攻一方却莫名紧张起来，唯恐战之不胜。待这种情绪层层传递到基层，就已经是“一见可疑现象”就要怎样怎样，没有悬念的胜利者此时竟流露出一副惊弓之鸟的失态。这种失态引发的斗争亢奋通常会被鼓励性地定义为政治思想过硬，对党忠诚。政治运动的紧张和残酷就是在这种忠诚和过硬的变态气氛中不断加剧、传递，待落到每一个被整肃对象头上时，这所有的压力就要

由那些落难者承受下来，没有任何人再能替他们分担。

2. 上级着手处理不合格的支部书记

终于，戴煌前一段支部书记工作中的小问题作为头盘先被端上桌面：

（检）查不积极的原因，领导是不抓紧的，没有把所有党、团员发动起来。

对张春波回去的问题（回自己原单位），没经过支委会讨论，他的（指张）情绪是不积极的。

对支部的疲塌现象没分析出原因，从主观上说，支委会有责任，一般地指出与号召不解决问题。对赫中的问题支委也要检查。

支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整顿思想要提出具体的来。

（李恩求说）：首先从戴煌同志检讨起，声讨手榴弹大会半途归来，¹对赫中管教不严，对沈以光的看法太右——（你）以理服人（的说法）当时就是（对同志们批判意见）泼冷水。（戴煌）要找沈座谈还要泡茶、买糖果——这与整个气氛不符。也不让我（党委李恩求）去听（人少的原因——原笔迹）。……（戴煌）反而表扬了本支部新闻自由写的好——（李恩求说）这非常刺耳。（党委）要找你谈沈以光的问题，你不谈。²

更高一层党的总支如何讨论处理戴煌的问题，戴煌本人不可能知道了。实际上“首先从戴煌同志检讨起”已经就吹响角斗的号角。只是此时，尚处在开局阶段，之后如何处理类似戴煌这种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是手起刀落，还是轻轻放过，上级还没有具体的处罚指示，不能用力过猛，唐突进攻。但先把他亮到退了潮的沙滩上，暂时停止他的党支部书记工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过分的。

¹ 笔者至今没有弄清“手榴弹大会”的含义。结合之后《前进》报的揭发材料和戴煌本人的性情，笔者认为这次会可能是对有右倾思想的学员或教师开的一个斗争会，但戴煌有不同于上级领导的意见。根据戴煌一贯的性情，笔者有理由推测他当时已对领导的布置愤怒难抑，失去自控。虽作为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但最终还是中途愤然离开会场了。

² 此段括弧中用语，是笔者在整理过程中，结合同期新华社机关报《前进》的揭发批判，为协助读者理解这段笔记添加。文中另有标记的一处除外。

3. 戴煌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做过什么？

结合后来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批判揭发戴煌的文字，不难读懂上面的记录。原来在戴煌主持党支部工作期间，擅自放一个张姓（疑似）右派分子回原单位；在支部要求批判沈姓右派时，戴煌却建议只开座谈会，还提出买糖果，用茶水，准备把对“对敌斗争”搞成同志式的茶话会。在同一个支部崔姓支委别具心机的建议或唆使下（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有很多同事，出于各种目的，都会跳得很高，很积极），¹戴煌专门在外训班讨论过一次新闻自由的话题，自己还积极发言，主动亮出同学们不知道的个人观点。

（三）明知山有虎

7月6日，戴煌笔记中内容：外交学院传达中央有关部门和邓小平的反右指示的会议。这是戴煌以基层党支部领导的身分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这时斗争的矛头已明确直指类似戴煌这样的党内右派：

李思求传达：邓小平在前天召开在京及参加人大中央委员及京军政党组负责人做了报告。昨天市委组织部开会处理党内右派分子问题，团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党内外的右派一视同仁，再不要给人家骂宗派主义，……真正危害的是党内右派。

杨芳传达：中组部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问题，有些党员不积极，同情右派，有的本人就是右派思想。有的跟人家跑了，有的跑了一会又回来了。有的对运动兴趣不大，对党内的右派思想温情主义，估计不足，没有深究。最好是从整风开始出现的右派言论（很有秋后算账的味道了——编者）（提意见反三害的不算）都要见（建？）账。正在草拟处理计划。……

这以后，戴煌就被召回总社，进行全社性批判。戴煌的工作笔记除了被别人揭发的只言片语，就剩一片空白了。他的支部书记生涯到此结束。

¹ 笔者用“别具心机”一词的根据：1957年7月20日《前进》上刊载的戴煌6月13日对党的意见，就是该崔姓同事兼同学记录揭发的。

这以后，这个月的笔记虽然只剩之言片语，但了解现代史的读者，大致能从这些短句
中读出他的思考和痛苦。¹

神话和特权，

农村干部一团糟，？？出蜕化分子的天下，

苏联干涉匈内政，美（国）帮蒋（介石）也是武力干涉？？

秘室小声？杀，可恶，

（社会主义）除道德品质外，不如资本主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愚民政策，

？（中共高级军官）不如美帝深入战场的程度，

党忘记传统，专讲自己享受，

个人崇拜，人民力量没有了，都是毛主席的。

社改（社会主义改造）太早太快，学校反右过猛，要批评。

搞错了要道歉，放走赫中，和张要开茶话会，

回家后问（妻子）大字报问题，²

毛主席不虚心，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评邓子恢，

毛、中央抓建设，忘教育，要检查，

选举不是真正的民主，拒不投票，³

右派分子也收到恐吓信，

对斯大林分子和风细雨是不行的，

佩服传教士，

匈事件后苦闷，

¹ 这些楷体字短句，应该是戴煌的同事们揭发他曾经谈论过的部分言论，或被揭发过程中他的想法。

² 戴煌在外交学院住校学习后期，他的妻子在社内贴出揭发丈夫的大字报。

³ 在前一年，戴煌曾拒绝到新华社所在地的基层投票站西单站去投基层选举票。

不用批评？，？？到处叫屈。

有良心的不能平静，说来痛心，

多领两个月国外工资六百元（？）

在上海不到十天就用了五百元（？）

在肃反中迟到早退，

生活水平超过大家，

用内参材料攻击党，

招摇撞骗的活动，¹

.....

7月6日晚，戴煌回到新华社。之后，迎接他的是历时2个多月大大小小十数次批判会，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机关报《前进》上几十篇揭发批判他的文章，这之中还包括他妻子揭发他的发言和大字报。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对戴煌本人来讲，无非就是往埋葬他的井里多投下两块更重的石头而已。

戴煌作为支部书记明明听到上级传达，很清楚如何打击有右派思想的人，特别是对党员。甚至党对这些右派分子无情的态度，他都已经心知肚明了。但他在日后却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初衷，甚至在批判他如火如荼时，还搬出连自己妻子也不知道的，在1956年底悄悄写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万言书”。该信中，他谈到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对他的影响，谈到作为记者观察到的社会腐败现象，谈他对匈牙利问题的看法，谈他对社会现状的忧虑，谈他的新闻自由观点等等.....

他是鲁莽吗？最近他一位多年老友郑仲兵先生谈到戴煌的执着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他共过事，我认为他绝不是鲁莽。很多事情，他是经过很多很周密的思考。问题是他经常在思考权衡之后，只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或者做法符合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他是

¹ 指戴煌1956年夏秋回自己家乡，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调查当地为非作歹的乡镇干部一事。

无论冒着多大的危险，都还是要坚持这样做下去，而且义无反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三、小结

1. “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的窒息和痛苦

邢晓群老师一篇文章——《曾彦修先生二三事》中回顾曾老有一句话，曾老在谈平反问题时曾说：“中国历代以来都很重视冤狱的平反。一个民族在发生了某种忠奸倒置的重大冤案以后，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都会为此而感到痛苦和窒息。”

其实，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的窒息和痛苦，不要等到重大冤案发生之后，更多的时候它们在大冤案发生之前或之中就已经存在了。1957 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和反右斗争，就是这种窒息和痛苦最好的体现。这种在被革命吃掉过程汇总产生的痛苦，甚至恐惧，贯穿了这些右派分子，甚至他们亲属子女生命的始终。

伴随这种民族精神和良心痛苦窒息的，是更多人们适应、习惯在政治运动中整人，且手段纯熟、花样翻新，乐在其中。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良心不安会是什么的感觉。民族思想文化在短短 30 年中，发生严重后退。民众的生活视野和心态在严重的自保求存中退化，变得更加自私狭隘。

2. 邓小平在 1980 年关于右派“改正”的一段讲话

也许能够回答“平反”和“改正”区别的最好答案是邓小平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一段讲话，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有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

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¹

据说在右派问题以“改正”告终后，全国没有摘帽的右派大约还有二三百人。

也许有人会讲，右派问题不是在1980年代初就解决了吗？但，这个问题真的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吗？如果是真正解决了，为什么至今右派问题被称为“改正”而不是平反呢？

被革命吃掉过廿多年韶华之光的戴煌，晚年曾做如是思考说，多打了99%右派的一场政治运动，仅仅就是扩大化这么简单吗？！如果这样，“改正”距离“特赦”又有多远呢！



【附件一】

“一起听讲座”微信网友同期提问²

1. 张三好书茶：反右仅仅是冤案吗？戴煌先生们信仰过的共别人产的主义，正确么？没有自由自主的意识，效忠于什么党什么国，是什么美德么？

2. 梨花开又放群：“反右”运动给现代中国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痛，为后来的文革爆发准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3. 梨花：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以及53名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毛周邓也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这样惧怕与憎恨知识分子，专门搞了一场运动？

4. 梨花：现在还有具有风骨的真正知识分子吗？如果有请列举几个。是否都被打断了

¹ 《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报告》，1980年1月16日。

² 此提问根据同期讲座后听众提问和争论整理而成。潘祛病整理。

脊梁？

5. 曾地：五七年反右之前，就有镇反以及 55 年的反胡风。有人认为这已经是反右的开始。但是却没有引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警惕。这点我不太理解。老师能够解释一下。

6. 木京 5：请问戴煌先生晚年是否想过离开那个组织？

7. 张三好书茶：所谓的革命饿死我家两口人，为什么不应该吃掉革命的儿子呢？把革命的儿子吃光了，不就不闹祸害全中国全人类了么？

8. 袁腾飞说全国只有 7 个右派未摘帽！这是邓设计师的问题吗？

9. 指点江山群友提问：可否理解为，反右运动是否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预演？

10. 感悟教育：是不是说这是对支持一个错误的对象的报应？

11. 张三好书茶：所谓的理想就是害死人也有道理么？许多人投奔革命，就可以为自己投奔革命开脱么？邓某说打右派也是当时的需要，和你讲的逻辑，有区别么？

12. 觅春风：为伟，不便回答的问题可以忽略。

13. 濛濛溪涧：右派们提意见的初衷本身是否就是自作多情？建议魔鬼改邪归正？本身就是建议者的错吧？？

14. 濛濛溪涧：从根上讲，知识分子们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是南辕北辙的，做无用功的吧？

15. 孤家寡人：何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16. 情感教育：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们的党从开始就是有问题的，他们的作为历来是江湖化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一个杀人越货的团体，这也要考虑！

17. 濛濛溪涧：“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历程，不应该自省么？

18. 张三好书茶：能不能替父辈留下的祸患认个罪，而不是喊什么冤呢？

19. 文德堂，老李《拒加群》：因为在野的共说的话 49 年以后完全没有兑现，难道当年的知识分子到了 57 年还没有看明白共就是骗子党吗？

20. 孤家寡人：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是什么？

21. 木京 5：我的老师跟您的父亲有相同的经历，希望可以另外找时间交流。

22. 知语堂群友：戴煌是想走现在的私有化道路，还是想走毛时代的公有化道路？
23. 知语堂群友：右派觉着自己冤枉，当初几百万所谓的反革命被枪决，右派们当时认为这些反革命冤枉与否？
24. 文德堂：张三的问题提得好啊！
25. 木京 5：尖锐的问题有助于老师研究。
26. 不哗斋：各种问题都可以，不过认为右派该死的，是不是过分了？尤其是现在还拿共产党钱的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27. 谢明华：提问题本身没有问题
28. 濛濛溪涧：知识分子们对当年土改灭绝地主， 对公司合营后灭绝资本家是了解的吧？怎么能熟视无睹？
29. 陈学峰：他们 49 之后完全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证明他们本身也是骗子的一分子。
30. 觅春风：五觉得第一次难免拘谨，比如说代父辈道歉这个就是故意刁难。
31. 谢明华：不哗斋，在你表达反对一种观点时，结果你也陷入到了另外一种极端倾向。
32. 不哗斋：有些人一边骂共党，一边给共党干活。太没劲！
33. 谢明华：目前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对父辈的反思。
34. 情感教育：我们有理由怀疑当年的“有为青年”参加我党的真实目的。
35. 不哗斋：是不是象鲍彤、高瑜都该死？他们也出自共产党。
- 谢明华：不哗斋、觅春风，你们作为主持人，在提问和回答的双方不应该带有明显的倾向某一方，主持者必须中立！
36. 木京 5：其实许多普通共产党员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受骗上当的，跟我们现在都是一样。当他们发现问题，已经反抗无力了。
37. 医疗器械厂家：父辈的奴性让我们耻辱，所以，我们必须对后辈负责。
38. 情感教育：有没有人比较当年国统区的青年和“投奔革命”的青年的组成比较？
39. 不哗斋：按你们的说法，中共反右和文革是应该的？

40. 青菜：我不同意您这个观点：目前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对父辈的反思！谢明华，事实上，我们连父母的人生里的遭遇过什么委屈都不可能清楚。又何来反思呢？

41. 不哗斋：有本事就脱离公职，像乔木一样。

42. 文德堂：49 年到 57 年八年时间，还看不清他们是骗子，当年的知识分子也就是……

43. 章哲 3、作为群主，我认为大家可以提任何问题，但是要保持对老师的尊重，特别是老师不回答的问题，尊重老师不回答的选择。另外，答疑不是讨论，一问一答，了解对方的观点即可，讲座没有观点交锋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其他时间、其他群进行。谢谢！

44. 不哗斋：有些人就是道德婊（指张三好书茶）

45. 谢明华：60 年前祖辈与父辈，缺乏独立思考，从不对自己的过错反思，至今后代依旧承受着他们带来的灾难。祖父辈的追求是可以歌颂的理想吗？至今还在玩“两头真”。

46. 文德堂：当年的反右、文革就是要打像他这种还记得共产党来时的承诺的人。

47. 章哲 3：将专制脑残群友移出，本群不可以“脑残”等词评论群友，欢迎心平气和交流。

48. 文德堂：年轻人都容易被骗。

49. 木京 5：曾地，这就对了，我老师也是新华社记者，也是被打成右派，弄得家破人亡。晚年深刻反思，反对现有体制，至死都被内控。但至死还是党员。

50. 曾地：今天的讲座，大家有这种反应，可能许多人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这种状态，中国的早期的知识分子脱不了干系。

51. 文德堂：当年不听胡适的劝说去台湾，留下来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帮凶，共同骗取老百姓的信任。

52. 曾地：即使是戴煌先生，直斥毛泽东骗了中国、骗了他，但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们骗了谁？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专制之下应该是怎样。

53. 濛濛溪涧：投奔失势落草的蒋的知识分子，不只是需要大局观，更需要摒弃如家为赢家背书的传统……

54. 曾地：当然，我们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做一个人，面对这个极权专制应该怎样去做！

55. 木京 5：我们今天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反对政府的人，当他们成功了，不再兑现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过来对付我们，我们不会也是帮凶？如果真的那样，我们就是帮凶！

56. 文德堂：问题是他们 50 年到 57 年就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

57. 木京 5：文德堂，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不要去支持，甚至现在就反对？

58. 曾地：木京 5，我们今天不洗一切代价支持反政府的人，党他们成功了，不在兑现民主先征得承诺，反过头来对付我们，我们不会也是帮凶？

59. 文德堂：49 年前他们就会带人上街骗人，50 年后他们没有做过反抗（陈学坤：应该是）

60. 木京 5：现在的自有思想远不及那个年代。

61. 踏浪歌行：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乌托邦，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浪漫、向往田园的理想主义者，而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符合他们的胃口，而现实为那个乌托邦暂时需要非常手段。那些知识分子“被骗”而成为“帮手”很正常，我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62. 曾地：对过去的口口，他们的局限，我们不必要一再的追究，更重要的是考虑我们自己，在以后的时间中应该怎样做，这才是重要的。

63. 木京 5：因为反抗才被打成右派，没有因为歌颂被打击的。很简单的道理，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现在支持的人以后会怎样。置身处地想想就明白。

64. 穿裤子的云：所谓的反抗，不过是先卖淫后撒娇罢了。

65. 章哲：穿裤子的云，本群别走下三路否则……

66. 穿裤子的云：说右派们都该死肯定是政治不正确。但说相当一部分右派死有余辜，答题是确切的。对于那些右派的后代，不是如何替先人鸣冤叫屈，而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附逆犯下的罪行。

67. 木京 5：穿裤子的云，你年轻，不了解。有空听听张敏老师的访谈。右派比你骨头硬多了。

68. 穿裤子的云：如果他们的狗头是用来认知不明的附逆，还不如让阿黄叼去算了。■

【附件二】

简答网友¹

1. 张三好书茶：反右仅仅是冤案吗？戴煌先生们信仰过的共别人产的主义，正确么？没有自由自主的意识，效忠于什么党什么国，是什么美德么？

反右不仅仅是冤案这么简单。但对当事人来讲，几十、几百万右派和上千万亲属子女，对这些人而言，第一位的就是冤案，是冤假错案。

但是对于制造这场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反右运动本身才是罪错。

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反右运动是场灾难，是走上一条弯路、邪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效忠”和“美德”：

我父亲，也包括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忠于的是他的社会理想，而不是共别人产。这个理想不仅对那一代人，即便在今后，追求社会向好永远不是罪错。我父亲一生秉持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他为追求这个理想，奋争了一生。

在不同时代，美德有不同标准。但坚守自己的信仰，并能随经验教训积累，不断提高自己认识，修整自己信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园，这就是超越时代的美德。我的父亲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反右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美德。这种美德不以时代不同而变化。我为我的父亲自豪！

当年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很多人的初衷是反对当时的独裁政权。他们是血性、正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那个社会的良心。他们就像今天许许多多有为青年一样，只是他们所处时代更早而已。

¹ 此文根据 2017 年 6 月 25 日对群友的语音答复，由潘祛病整理。此答复中，有胡鹏池先生和木京女士的建议意见。在此向二位老师诚挚谢意。

2. 张三好书茶：所谓的革命饿死我家两口人，为什么不应该吃掉革命的儿子呢？把革命的儿子吃光了，不就不闹祸害全中国全人类了么？

您的表述似乎也有逻辑性。但这个逻辑能否成立，恳望大家都能思考。我现在能回答您的就是，革命即不该饿死你家两口人，也不该吃掉革命的儿子。

因为共产党内的思想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有野心家，有名利之徒，有争权夺利；但更有终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今天怀念的胡耀邦、赵紫阳，敬重的李锐老等人，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3、指点江山群友提问：可否理解为，反右运动是否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预演？

当然是预演。两者都属于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但在具体的运动对象、运动目的、运动性质、运动方式上有很多不同。

反右和文革，包括期间套叠的小运动，都属于“阶级斗争”这个系统。但是反右、反右倾属于普通版，四清属于升级版，文革就是超级地震了。反右与文革前其他运动不同在于，它在早期就绞杀了民族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能力。

4. 张三好书茶：能不能替父辈留下的祸患认个罪，而不是喊什么冤呢？

有冤情当然要喊冤，更要伸冤；有罪当然要认罪。此次讲座的主旨本身与喊冤无关。对于不同的具体的个体，应当是不同的要求，绝不能罪错人人有份。

笼统地讲什么父辈留下的祸患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历史罪错人人有份。假如历史的罪错笼统地让我们的父辈认了，实际上就是放过真正有罪的人。您是这个意愿和动机吗？我希望不是。但是您的思想方法有问题。

5、文德堂，老李《拒加群》：因为在野的共说的话 49 年以后完全没有兑现，难道当

年的知识分子到了 57 年还没有看明白共就是骗子党吗？

社会变革的实践是一种探索，任何人都不是社会变革的天才。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茫；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会身不由己。但在任何时候，我们决不能做超出人性底线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民族就会越来越好。

中共在野时期提出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进步方向的。追随这个理想的青年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在那个年代，这些有为青年不会想到他们的真诚和热血会被欺骗和利用。

其实很多右派已经是先知先觉者，在中共建政后的六七年中，他们已经逐渐发现国家存在的问题，并在 1957 年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遭遇了人生廿多年的苦难。

6、文德堂：当年不听胡适的劝说去台湾，留下来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帮凶，共同骗取老百姓的信任。

确实是留下的都没有过上好日子。但你要将他们都笼统地视为帮凶，就太过分、太偏狭、太缺乏良知了。是的，走了的人（去台湾）确实免了许多个人的痛苦，但起码也没有和他们的父老乡亲同甘苦。那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觉醒有过什么贡献？留下来的人再软弱、受骗上当，但他们和他们的父老乡亲一起共度了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岁月。

我认为，从错误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出真相走向和解，才是正道。当然汲取历史教训，正视历史伤痕的，首先应当是执政党。

试问，无端指摘怨报历史中有理想、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思维，跟阶级斗争治国有多大不同呢？■

【专 稿】

怀瑜握瑾 正道直行¹

——追忆先父戴煌

为伟 晋京

新华社很多人不理解戴煌的单纯天真，总觉着他一辈子生活在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心境中。2012 年秋天，社里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约已经 84 岁的爸爸做一组肖像照。²拍照中，摄影师突然问：“老戴，你是反革命吗？”拄着拐杖的爸爸一下子激愤起来，脱口而出：“我不是反革命！”一时间，他脸上的愤怒、委屈、倔强定格为永恒，成为摄影师和许多人认定的戴煌内心世界的表情。

一位大家熟知，经历坎坷、执拗坚韧的老记者，虽被改正多年，赢得过广泛赞誉，为什么还会在夕阳晚景安享生活中，一提起当年还要激愤不已？这得从头说起。

一、《歌唱领袖毛泽东》

“我小学……毕业前，学校音乐老师弹着风琴，教六年级的全班同学唱聂耳词曲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而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每次唱，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恨不能立即奔赴战场与日本强盗拼个你死我活³。”

¹ 此文是 2016 年 6 月 5 日，戴煌的女儿在八宝山向杜导正老夫人续志先老人告别后，接受前《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冯立三约稿所作。待同年 7 月 10 日交稿时，老炎黄已玉碎。冯先生为此稿不能再由炎黄刊出感叹不已。

² 本期封面戴煌照片即为此次拍照作品，摄影师：郝远征。

³ 戴煌遗稿《我为何不再敬重毛泽东》

提及往事，爸爸会唱起这支歌，苍老悲凉中仿佛还饱含着少年人的诚挚与热忱。上世纪30年代，我的爸爸，一个璞玉未琢的苏北小镇孩童，怀揣习武终南山，铲尽天下不平事的天真，慢慢被《毕业歌》浸润，逐步走近他的理想。

1945年，爸爸17岁，参加新四军苏北文工团一年了。平素他喜好写作，经常为团里创作小节目。战争时期，无论是行军打仗的短暂间歇，还是部队休整，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给地方或部队报纸投稿¹。爸爸的小豆腐块文章经常很快见报，还获过几次奖。他的热情受到鼓舞，写作劲头儿也更高涨²。

爸爸1944年6月9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距他参加新四军不到50天。直到晚年，他还经常提起那时从《盐阜大众》上读到的一句话：“努力奋斗，英勇前进，为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天下而奋斗不已³！”从那时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层次分明的八个字替代他少小时仗剑走天下的幻想，明确他高小结业时《毕业歌》的方向⁴，成为他一生不懈的追求。

1940年代，中国一支在野政党领导的军队，高擎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爱国主义、民族解放的大旗，与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争夺地方自治权。无数怀揣社会理想的热血青年不仅没对这支军队以匪视之，还从其倡导的这八个字中读出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希望，义无反顾投身其中。无论后来这些人各自的道路、结局如何，但当初，不能不认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奔着这种社会理想的召唤而来。这种召唤给中共带来了源源不断洪流般的新生力量。民族救亡的号角声，也在爸爸心底引发强烈共鸣。他朴素的爱恨情仇在这美好理想的感召下升华，引导他追随这支军队奔向心中的乌托邦。

¹ 这些报纸也不断地给我寄报纸，我从中感受到当时最广泛的激情——“努力奋斗，英勇前进，为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天下”而斗争不已！（先父遗稿《我为何不再敬重毛泽东》）

² 1943年夏天苏北日寇发动大扫荡，我和很多乡亲在几条田埂小路上向前跑，几百米后的日寇开枪追杀。有些年岁大的人实在跑不动，被鬼子围住，有人听到鬼子中有个翻译官对他们讲话，其中有一句汉奸翻译得很清楚——“谁家有人参加新四军共产党，就杀尽他们全家！”（戴煌遗稿《我为何不再敬重毛泽东》）

³ 戴煌口述，谭林茂整理《穿过三个国家的枪林弹雨》，《新华业务周刊》2015年第38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⁴ 戴煌遗稿《我为何不再敬重毛泽东》。

1947年，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爸爸站在文工团驻地的草屋后，面向西北方向，默默地流着眼泪，他从心底为伟大的毛主席担心！当天，他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唱领袖毛泽东》来抒发强烈的情感。文工团在舞台上表演过这支歌，苏北部队中也曾传唱一时¹。

1947年夏天，19岁的爸爸被调到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的一名战地记者。彼时起，爸爸逐步意识到自己是为革命鼓与呼的“喉舌”，但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更是为困境中百姓呐喊的喉舌。随着时代变迁，到爸爸晚年，执政党愈加强调新闻人是党的喉舌时，他的意识也更为明确：新闻本来就是人民的喉舌，理应为百姓的疾苦高声呐喊，为民众的福祉鼓与呼。这，使他显得很另类。

爸爸在人生的韶华之年带着他美好的理想，从自己喜爱的写作起步，就像一个朝霞的清晨那样令人心胸舒畅。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和爱好竟会是他一辈子命运艰辛的孽根。

二、战场之外的两件事

公元两千年后，曾经命途多舛的爸爸并没有更多回味职业生涯带给他的苦难，倒是常常提起两件久远的往事。

1951年秋冬，爸爸以军事记者身份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在2011年3月5日写给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社史编写组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川登陆后，在三八线一带两军对峙时，北朝鲜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1952年春天，他（指金日成）还要在平壤做他的四十大寿，并从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农村赶了几十头牛到平壤宰杀，为其四十大寿的盛宴添加美味。那时，我到志愿军47军141师采写完了罗盛教的事迹后，又回到147

¹ 1947年开春，国民党胡宗南匪军攻占了延安，毛主席等人还随同彭德怀将军的部队坚持在陕北与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寻找战机歼灭敌军。我很挂念毛主席的健康与安全，坐在驻地的草屋背后向西北方向瞭望，担心得不停落泪。回到屋里，我立即作词谱曲，写了首《歌唱领袖毛泽东》的小调，歌词有六段，其中一段是顺便歌唱朱总司令的。歌本很快就下发了，苏北的一些部队还传唱过，苏北文工团的同志们也登台演唱过。（戴煌遗稿《我为何不再敬重毛泽东》）

军 139 师 415 团继续采访。415 团的刘政委就向我叮嘱，准备要我与 415 团的一位副团长带他的一个警卫员，出席平壤金日成四十大寿的宴会。因为当时要志愿军每个团出席三人。”

牵几十头“骨瘦如柴的”牛给战争中的将军祝寿¹，青葱年岁的“老”战地记者看不惯，“当场辞谢”了盛情²。这时，一直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爸爸，还顾不上更多观察思考战场以外已经发生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世俗冷峻的现实，已然在他心中悄然撕开一道裂隙。

父亲的韶华年代，在一场场国内、国际的战争中流过，少有停歇。1954 年春，从朝鲜战场回国不久，爸爸又被派往越南抗法前线。那时候被派往战争国家的驻外记者，在党和组织信任的背后，更多意味着困苦与牺牲³。爸爸无暇顾虑个人安危，很少会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场所听汇报做访谈，年轻就是活力和胆量。他经常到最前沿阵地，高效率采写发稿，给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留下深刻印象。

1956 年，爸爸的《胡志明主席印象记》小册子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在这 14000 多字的长通讯中，父亲除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同胡志明的交往，更多的笔墨是胡主席简朴的生活习惯，严谨的学习态度，谦逊的修养品德，对广大工农民众的诚挚热情和他勤奋的工作状态。这篇通讯反映出 1950 年代，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感情，对胡志明的刻画生动详实。几年前，有人曾问年迈的爸爸：“《胡志明主席印象记》是篇很好的通讯，当时为什么不在新华社发通讯稿呢？”老人的眼神简单无辜，摊开双手：“1955 年春节过后，这篇通讯我就写好了，可是当时社里不同意发。他们说，毛主席过春节没有去基层慰问群众，发这样的稿子不合适。”

爸爸的稿件没被工作渠道采用，他会怎么想？不得而知。但被拒后，他还要通过其他途径让文章面世，宣传他看到的生活工作中的胡志明与毛泽东不同的一面，已经说明他当

¹ 先父在回忆此事时，总会用“骨瘦如柴”来描述那几十头牛。

² “当场辞谢”是 2011 年 3 月 15 日戴煌在写给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年培荣《关于社史修改的意见》一信的底稿中的表述。

³ 在把父亲派往越南抗法前线前，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组织上认为那时已年届 26 周岁的爸爸还没有结婚，万一在越南牺牲了，对不住他。遂催促要求他尽快挑选一个交往比较多的女性朋友成家。此事促成爸爸的第一次婚姻。

时的思想倾向¹。

可在已出版的这篇通讯中，还是省略了两个最重要的情节：一是胡志明制止民众喊他“万岁”；二是胡志明对当时中国政府大宴兄弟国家来访人员，浪费极大，表示不满²。以父亲到晚年都具备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和缜密思考能力，在他年轻时，不可能不洞悉或根本忽略这两个与他的社会理想密切相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太有针对性，太触动思想了。但是，对此，当年爸爸为何始终未置一词？

现在看来，爸爸肯定还是接受了组织上不发这篇稿子的部分理由，³认为将胡志明反对喊万岁的情节写进通讯，不符合国情，会引起读者认识混乱。同时爸爸还是一名恪守组织纪律原则的党员。1956年，在组织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要求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谈论。尽管此事对爸爸思想震动极大，但他还是遵照组织要求，对自己不够参会资格的妻子不谈论此事⁴。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决定，当然自己不能违拗组织要求。最重要的还有，爸

¹ 1957年秋在批判戴煌的新华社社内报《前进》中，有一段话谈到社里不给发这篇通讯的事情。

² 2012年《炎黄春秋》主编杨纪绳曾向戴煌约稿《1957年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原因和代价》（要查在哪期炎黄上发表过）文中曾有这样的叙述：“……他（指胡志明）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都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一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还比较实事求是，我领情了；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领导人‘万岁’什么的，他不同意。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自己还没有别的词儿能够表达对一个人的敬慕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能像封建帝王那样要大家喊‘万岁’，对不对？’

我点头称是。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了一个我压根儿也想不到的问题。他说：‘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我一时语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现在面对胡老人家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

他捋捋他那把灰白色的胡须，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唔——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国家的钱呵，也就是人民的钱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这，又给我开了窍：我们的那种‘礼仪之邦’云云，只不过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大耍特权的遮羞布罢了！”

⁴ 对党的意见看法，只能谈给党听，直到1956年底，戴煌想明白了一切问题，提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意见信时，仍旧是

爸自己没有完全想明白，他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遇到的这两件事，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在中国会呈现出什么状态，与他的社会理想有什么必然联系。但爸爸善于思考，胡志明的言行做派明显在爸爸的理想中注入了特殊的助燃剂，使他心底渐渐明朗。

就像“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也许有着美好社会理想的共产党员心中，共产主义的样式也不尽相同。爸爸心中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直到他离世前，这个理想依旧没有丝毫改变¹。但如何走通这条“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路，大概是这些革命过来人的共同困惑。一些经历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老革命，到晚年逐渐领悟到社会变革方向一定要以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为福祉，他们被人们称作“两头真”老人²。爸爸也许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少年到白首，他虽为此经历过人生少有的磨难，却矢志不渝，紧握手中一只笔，坚定地秉持理想，无论世风如何变换，直到人生的终点。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三、爸爸的“滑铁卢”

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燃尽了爸爸心中那团乱麻。他终于可以将所有牵绊理想的事情串连起来，从国际到国内，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家干部的安逸生活到广大农民的贫困疾苦，他看清，此类种种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并没有走在党倡导的奔向理想社会的征途上。

到1957年反右运动时，新华社当局针对爸爸的“战争”终于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爸爸终于在此遭遇到自己人生中看不见硝烟的“滑铁卢”。著名的“引蛇出洞”只是战役的开局方式，爸爸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曾对此有详尽描述。但书中，他并没有更多讲述自己在这个战役中的抵抗煎熬，也很少叙及

背着妻子，不做任何非组织的私下议论。

¹ 详见文尾丁若然给戴煌做的录像文字。

² 老记者杨继绳曾用“两头真”一词来形容这样一些敢于讲真话的老同志：青年时曾经立志要为“真理”而献身，中年时代却迷失了方向，到如今进入耄耋之年，倒“觉醒”了，又想要为“真理”而斗争了。

对方凶悍无理胡搅蛮缠的进犯。

实际上在1957年新华社社内报刊《前进》中¹，批判戴煌虽不乏断章取义，但还是较详尽地记述了此役围剿他理想的大部分过程。

从7月20日到9月9日出刊的《前进》报中，目前看到有7期涉及对爸爸的大篇幅批判²。在这里，不妨试摘几段以飨读者。

——7月20日：“……，戴煌避重就轻的‘检讨’引起到会的同志很大的不满，……这时戴煌继续讲他检查的第二部分，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极端民主自由思想，极端平均主义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从他的家庭出身谈到他十六岁参加革命，取得了一些成就……主席宣读同志们纷纷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谈同意章伯钧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党天下的问题？’‘戴煌说我们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与特权，这是什么意思？’……戴煌接着说：‘那就谈谈政治设计院……我只是联想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当时并未认识到他的用意是向党开炮，相反认为他敢于向毛主席提意见（我对毛主席也有意见）。同时认为这样可以说明我们有民主。’³”经历过几十年政治运动，莫说“老运动员”，就是年轻人也很清楚批判别人时，不能轻易牵扯自己。谈花瓶党党魁给执政党主席提意见，偏偏还要带出自己也对党主席也有意见？难道爸爸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战场，对方已然披挂整齐，正在刀枪剑戟对准你的软肋吗？兵戎相见，爸爸为何还要如此迟钝？！

该期《前进》还刊载了《戴煌的一些反动言论》，摘录六条同事们背对背揭发出的父亲平时的政治言论。这时的爸爸已经处在众叛亲离的工作氛围中，让他彻底闭嘴，攻破这座坚固的堡垒当然只是迟早之事。。

——8月12日，《右派分子不彻底缴械投降，我们决不鸣金收兵，总社再次集会驳斥戴煌反动言论》：“在8日下午和晚上，……会议主席方实同志首先让戴煌继续交代。戴

¹ 在此诚挚感谢李慎之先生为他后代留下的这份《前进》。它使我得以真实地瞻仰前辈坚守理想时经历过的痛苦磨难。

² 由于无法看到更多《前进》，无法断定该报刊是多长时段出版一期。估计是根据信息量大小，或其他需要，3至5天出刊一期。

³ 《共产党员戴煌集右派言论之大成，代训班的同志严正批驳》，《前进》，1957年7月20日，第一版。

煌谈了约一个小时……他说他反领导的原因，是对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满……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更悲观和失望了，不仅对新华社失了信心，对党也怀疑了。”

到会的人对戴煌的交代都不满意。国内部穆家军同志第一个起来批判戴煌。他说，右派分子戴煌对党的进攻是多方面的，在农村问题上对党的进攻特别猛烈……使用的手法比一般右派分子更加毒辣……”

国际部穆广仁同志发言时指出，戴煌今天并未表示愿意老实检讨和交待。……借检讨名义再一次向党进攻，……戴煌今天的检讨就流露了对大字报批判他表示不满，明明是对大字报又放了一枪。”

……印厂工人驳斥了戴煌关于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太低的胡言乱语。”

批判会在晚间继续举行。国际部文有仁同志首先发言，……我们的民主自由问题本来已经解决并且也习惯了的。但戴煌不要我们的自由……他今天以检讨为名继续进攻是为了什么，要彻底交代反党的动机，否则是混不过去的。”

学习室刘修学同志从理论上和事实方面痛斥戴煌污蔑党员和国家干部是特权阶级的反动谬论。……指出戴煌这个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特点不仅是毒辣、猖狂、全面的、系统的，而且是有明确的纲领和理论基础的极端危险的右派分子。”

多么齐心的“都不满意”，多么全面准确的揭发批判。直到爸爸晚年，和当年同在国内部的难友偶尔闲谈时才得知，原来这都是批判会前，领导细心缜密安排好的批判发言。¹

——8月19日《前进》第一版头条《戴煌理屈词穷被驳得哑口无言》，提到15日下午对爸爸的批判会。在会上，爸爸被过去的同事，现今已与他彻底决裂的愤怒的敌人狠狠抓住不放：“他甚至说他要成立‘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并不是要反党。他又说他写‘万言书’的动机第一是‘为民请愿’，第二才是攻击党中央，而攻击党中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

¹ 姚昌淦，当年新华社国内部记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据悉他是受戴煌单线领导的右派，不在爸爸军事组右派小集团之列。所谓单线领导，就是1956年秋，他与父亲同在外交学院学习英文，课间，父亲谈到家乡坏干部鱼肉乡里，乡亲告状无门，新华社领导偏听偏信，父亲准备去更高一级组织部门投诉。姚听说后，义愤难平，下课后跟随父亲一同去告状，遂成戴煌单线领导之右派。

国内部开始批斗戴煌时，国内部党委领导方实和戴邦找姚昌淦谈话，姚原话说：“f和d恶狠狠指着我说，你要好好交代和戴煌的关系。老老实实告诉我们，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实话告诉你，你只有彻底揭发才有出路！”

反党。”

报道已顾不上自相矛盾的表述，标题上“哑口无言”的爸爸还在不断为自己辩护：“他甚至在会上继续对党污蔑，在谈到特权阶级时，他恶毒地拿地主、资本家来影射党中央，说对于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来说，罪过在于家长，同样对于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来说，罪过在于党中央，下面的党员是无罪的。”

——到8月22日，《前进》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同戴煌的说理斗争进入高潮》，被说成是“哑口无言”的爸爸，这时，已经被批判者认定“体无完肤”。可他又提出一个“十大纲领”：“戴煌系统地提出反动的‘十大纲领’并且辩称他的动机‘不是反党的’”；“戴煌仍不肯全部投降，会议主席方实责成他继续交代¹”

——车轮大战翻来覆去，到8月31日，《前进》第一版关于戴煌的标题终于换成《本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一项重大胜利，戴煌谬论破产开始低头认罪》²：“（8月27日）他只好说：‘大家的批判我都接受，有些问题我还未认识清楚的，回去再想想，翻翻书，看看同志们的发言，我不保留了。’”看得出，巨大压力下，爸爸语言里已经显出很不耐烦，多次试图“拂袖而去”未果³，批判者的目的快达到了。

“会议主席方实同志最后说，我们对戴煌的批判共开了三次大会，九次小会，会上揭发了戴煌大量的反党言行，对戴煌每一个反动论点都做了深刻的批判。……关于戴煌个人问题的批判今天暂告结束，本星期四（8月29日）开会，由戴煌交代具体反党活动和小集团问题。”

比起九年后文革，新华社1957年绞杀右派思想的举动显得很文明。反右者，从单位领导到普通干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出色完成上级组织布置的任务。关键在于，爸爸反动言论密集、成体系，还偏偏坚持维护自己的立场不动摇，给反右者设置了不小阻力。但这也正好显现出斗争的艰苦复杂，给积极向上、蓬勃进步的以往的战友加同事提供了一个可

¹ 该篇文章中第2/4个小标题，《前进》1957年8月22日。

² 此稿是指8月27日下午的批判会。

³ 《前进》8月22日批判戴煌文章中的用语。

遇不可求的斗争靶向。批判戴煌成就了同事们向上进步或平稳着陆的垫脚石。

爸爸对政治运动的抵抗只能在日记中向自己表达了：

“身屈志不低，傲骨根根全；

昂首天下走，功成再相见。

“他们是一层黄沙，大风一吹，刮得漫天蒙雾层层。胆小无志的人怕沙子钻到眼里，闭着眼，大声嚷嚷：‘啊呀，厉害呀，真了不起呀，真有一手啊’；镇定志坚的人，却偏要睁大眼睛或眯虚着眼看到究竟。结果很清楚，这不过是些灰沙，只是藉着一阵风，才这样漫天狂呼。待风息地静的时候，天空晴朗且静，沙尘不知落向何处了。

——1957年11月5日下午，参加对资料组‘右派专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会有感”。

1

不知又经历了多少次批判，1958年4月，意志坚定的爸爸践行了他在批判会上的表态：“……为了自由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准备坐牢，准备失业后就去流浪……”²可那是“全国一盘棋”的时代，组织上怎么能轻易放逐一个思想言论与党相悖的共产党员随意出去“流浪”呢？爸爸被迫交出党籍、军衔、职位、工作和薪水；以妻离子散为交换，带着他未竟的，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社会理想，被发配去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劳改营。

附：戴煌的主要反动言行：³

1、反对党的领导。说“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认为自中央、毛主席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党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那里没有黑暗的深渊”。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2、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认为“中央极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和自由”，人民代

¹ 摘引自戴煌1957年日记。

² 《前进》，1957年8月12日，第一版。

³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中关于戴煌的部分，1958年2月9日。爸爸受到2类处分，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表大会“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

3、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罩着千百万人民”。

4、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主张记者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争取“新闻自由”。

5、污蔑苏联。认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不满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6、组织反动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以他和李耐为首组织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反领导活动，阴谋撺掇解放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

四、目标正前方

1978年10月4日，爸爸重操旧业。他很幸运，是最早一批被解决右派问题，重返原单位工作的人员。在那度日如年的艰难中，早一天解决问题，恢复工作，对一个家庭来说，或许就是天大的幸福。¹

经历过廿一年人间地狱、九死一生，爸爸还会是“志不屈”、傲骨全”吗？

党籍还没恢复，任务就派下来了。总社开出正式采访证明，差爸爸和另外两位资深记者共同采访文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首要人物薄一波。

历经数月采访、核实，稿件发表时，恰逢中央又有不要宣传个人的风声传出，虽未形成文件，但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薄老在逡巡数日后，一纸诉状将爸爸告到中宣部，²大意是，

¹ 虽无关主旨，但仍要提一句：在爸爸被平反后不久，新华社的另外一名右派，被通知回社解决问题。此公携妻将雏，破烂行李，到新华社传达室电话本单位上司。当领导在电话另一边回复，马上来见他时，此公激动不已，当场心脏病发作不救而逝。

² 在采访写作过程中，由于任务都由爸爸一人担任，另外两名记者在很早就主动退出采访任务。

戴煌采写、发表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的文章是“道听途说”，与我薄某人无关。¹爸爸很气愤，他开始为事实真相，为自己记者的名誉据理力争，甚至欲与国公对簿公堂。²

1987年，薄访美，爸爸这篇流传到海外的报告文学被薄看到，华侨对薄公文革时的遭遇深表同情，赞誉之声日隆。一时间这种话语竟形成一个良性氛围，遂使薄公生发请人为自己做传的念头。

回国后，薄老转辗托人来与爸爸言和，希望他能再次主笔自己的传记。这时，胡耀邦已经下台，作为新华社资深的报道国内政治时事的记者，爸爸深明耀邦出局于薄一波所起作用的关系。³因不屑于薄的政治品质和对耀邦的爱戴，爸爸婉谢邀请。后来，在庆祝《大学生》杂志创刊一周年紀念会上，爸爸偶遇薄老。这时周遭知道爸爸与薄有矛盾的朋友都希望此时他们能握手言和。可爸爸却目光直视前方，从薄老身边经过，形同陌路。自此双方永远陌路。

薄老如日中天之权柄，对一位记者或许能有些用处？社里不乏记者因采访高官，逐渐步入政坛，成为一方大员。爸爸从不做如此考量。

1980年代中期，爸爸频繁接到表扬多行业重点人物的采访指令。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党的喉舌应有之意。

从首钢公司周冠五，到协和医院方圻，再到当年语言学家丁声树和一机部副部长沈鸿

¹ 薄老还未恢复工作，戴煌受命到国务院招待所采访薄，此后经历了薄转住305医院周恩来曾经的病房（表明其政治待遇已大幅度提高），直至薄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春节，是戴煌返京后第一次与家人团聚，他早早躲到招待所去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稿件。三天后，当新春开工的钟声响起，戴的三万字长篇通讯草成脱稿。

戴煌与采访有关的所有人核对、修改稿件，薄本人亦亲笔修改，甚至连他被抓捕时所穿大衣的颜色都修正过。在准备发稿的前几天，薄突然告诉戴煌，还是不要发稿了。戴力争，告之这是组织宣传任务，但无效。不久，薄又有话，孩子们说，二月逆流的稿子（宣传叶剑英的）在杂志上刊载，期刊都被读者一抢而空。他子女盼望这篇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这时，长通讯时效已过，戴把稿件交给一个大型文学月刊，作为报告文学发表。谁成想，已经位高权重的薄老又再次变卦，说中央有精神，不让宣传个人。已付梓发行的文学月刊被迫全部收回。随后薄一纸书信递到中宣部宣传动态，控告戴煌道听途说。著名记者道听途说，很快未经调查核实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宣传部门。戴煌没有低头，也没有去找薄说小话。爸爸多次口头，笔头据理力争，向中宣部反诉此事，坚决要求薄收回“道听途说”的说法。中宣部为此多次与新华社协调此沟通，朱穆之、贺敬之亦出面抹稀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² 此时，薄已是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³ 戴煌是新华社国内部做政治报道的记者，了解胡耀邦下台的部分原因和薄一波在胡下台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等等。略去他采写表扬稿的思想和技巧，单说弘扬沈鸿精神的《目标正前方》要发通稿前，社里最高领导希望爸爸去他办公室共同磋商研究稿件。此时正是社里各部门领导班子调整阶段，已经主持全面工作的郭超人副社长明确和爸爸提出：“老戴，有空的时候要多到老领导M家跑跑、坐坐。”

爸爸走进老M办公室时，郭超人的话犹在耳。看到领导桌上沈鸿通讯的打印稿时，爸爸心里明亮着的只有一件事情：领导又想像当年讨论焦裕禄稿件一样，来磋商自己写的文章了。¹爸爸知道讨论稿子的最后一步，就是由原作者请求领导帮助修改通讯，接着主动将领导的姓名署在稿件第一作者的位置。爸爸谈完工作，拿起桌上的稿子，问到：“你还有其他意见吗？”对方不置可否。爸爸后来对我们讲：“我毫不客气，拿起自己的稿子就出门了。”爸爸不是不明官场，廿多年的苦难之后，他宁愿更疏离位高权重者。

但爸爸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很谈得来，以致一段时间，项南强烈希望爸爸去福建帮助自己工作。商调函发到新华社后，领导一句“我们坚决不能肥水流到外人田”暖了爸爸的心。后来我们问爸爸：“当年您要是去福建，就马上升格部级了，您的房子、医疗待遇等等，各方面都会有改善。您干吗不去呢？”爸爸对我们说：“我当时就觉着，社里还是拿我当肥水，我就不走吧。”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毕竟爸爸更喜爱新闻写作，更何况他也不是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很多年后，爸爸和项南都退休，他们来往更密切了。

无涉爸爸理想之人，爵位再高，不谄媚阿谀，亦无畏惧。戴煌于官场的淡漠和距离被很多人看在眼里，议论纷纭。

1949年始，中国社会呈现一个突出特点，各种类型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政治冤案尤其突出。从水深火热中九死一生，戴煌深知冤情意味着什么。

爸爸从不漠视、不丢弃任何一封投寄到办公室的申诉信，从不拒绝倾听登门上访者的申诉。一些同事对他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侧目、讥讽者有之。一个深秋傍晚，爸爸下班，

¹ 著名通讯《焦裕禄》本来是由新华社记者周原采写。后这位领导修改了几个字，创造出一个焦裕禄将毛主席语录放在枕头下面的情节后，就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一位衣着寒酸的上访者跟随他一同进了家门。未及两句话，爸爸的一位同事敲门进来，却没有什么紧急事，就那么在我们起居很促狭的小房间里侧目爸爸和上访者谈话。爸爸倾注在上访者谈的事情上，妈妈给两位身份迥异、目的不同的来客各削了只苹果。

1980年后，爸爸公开发表的通讯新闻相比1950年代要少，内参稿件却越写越多。勤奋写作一直持续到爸爸退休，甚至延续到他耄耋之后。1993年，受创办不久的《炎黄春秋》杜导正老之邀，65岁的爸爸开始深入采写胡耀邦和冤假错案平反的情况。¹

爸爸热情高涨，事无巨细，买车票去外地采访，撰写、誊抄、复印、与受访者核对事实，多年的职业习惯，使他件件事做起来有条不紊。爸爸的工作习惯，所有采访，成稿后一定要核实二到三次，由受访人签字认可，才算落实。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自带复印纸到原单位复印室复制初稿。可不久，原单位找个理由，爸爸复印的渠道被阻塞了。无奈中，爸爸只能又带着复印纸，拖着在北大荒劳改时被爬犁轧伤的左腿，踉踉独行，到老干部局去复印。爸爸只能假装没看到管理复印机的小同事脸色有多难看，也不介意他粗鲁检查复印的内容。这时，爸爸心里只装着胡耀邦和那些冤假错案。

每年年底是社里全国分社社长会议的时间。一些好心的分社社长把会上主管领导的讲话传进爸爸耳朵里。时任国内部主任说，有的老同志非常不自觉，已经离休，关系都不在我们这里了，还经常来复印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东西，被我们坚决制止了。正说着，时任老干部局局长阴阳怪气地添了句，你们倒是制止了，又到我们这里来了……

政治风波之后不满5年，写胡耀邦是件异常敏感的事。哪位领导愿意承担支持老戴做这件事的责任呢！爸爸只好不再考虑采访的内容是否需要保密，他把要复印的稿子化整为零，不断交给自己的孩子到街上小店里去复印，赶不及用时就自己誊抄数份。

饱经沧桑的爸爸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容易激动或与人争辩，他把所有的行动都指向心中的理想。在他看来，那些议论纷纭、侧目讥讽不过是些过眼的风沙。透过这些沙尘，爸

¹ 戴煌在此之前已经积累很多于胡耀邦有关的冤假错案资料。他对胡耀邦的崇敬从1980年代初就产生并逐步加深。由杜导正老的机缘，后成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爸能看到他心中“风息地静”，“天空晴朗且静”的远方。

五、爸爸的红色

在1940年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的期许，党高擎着这面旗帜向全社会民众发出召唤。这八个字饱含的社会理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更是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美好的国家和人民心向往之的社会愿景。可以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应该代表中共党的初心！自从爸爸投身革命，这八个字就铭刻在他的心头，这，也是爸爸的初心。

爸爸离世后，傅国涌在他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也许将来的人们会对他身上的红色印记感到遗憾……”¹父亲离世后，很多新闻界后生都提到这一点，甚至有称他为“红色记者”。

的确，爸爸的初心和红色有关。晚年的爸爸看不惯甚至痛恨现在社会上很多丑恶现象，对现实社会感到深深的失望。笔者曾很不解地问过他，既然您已经这么失望，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老干部局例行的党支部会，还要积极地交党费呢？爸爸呢诺沉思片刻，长叹一口气说：“我不能忘记和我一起在战场上拼过刺刀，流血牺牲的同志；我不能忘记我们入党时的承诺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八个字……”

爸爸心上的红色不是某些“二代”掌握党国大权的朱印；不是某类后裔独占社会资源的铁卷丹书。也不是继承革命传统，“重走长征路”上的猎猎赤旗，更不是涂抹到人类历史上的毛式阶级斗争的血污！爸爸心中的红色，是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的热血，是他们把自己作为牺牲敬献给革命祭坛时留下的不朽印记。

当自由只剩下忠君爱党的自由，当民主只剩下“橡皮图章”的民主；当平等成了特权阶层的遮羞布，当博爱成了“你死我活”的代名词，革命的初心早已荡然，留下的只有重拾理想的苦斗和孤独。

¹ 《“神化”“特权”今犹在——纪念戴煌先生》，傅国涌，博客中国，傅国涌的专栏，<http://fuguoyong.blogchina.com>，20160708。

爸爸在心中永远怀念着自己的初心，自己的战友，即便在病榻弥留之际，他对来探望他的后辈说：¹

“我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是思想还像过去那样，对毛泽东迫害那么多人，我对他是很痛恨的。现在我们老人里面有一句普通的话，叫剩者为王，是被毛泽东迫害的人，还没有死的，剩下了的人。……毛泽东死了40年，我就成了这剩余者（之中的）一个人，……对毛泽东说了很多剩余者的话……，我们能够活到今天，也真是不容易啊。祝贺（希望）你（杨联三）和陈琦（两位都是父亲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一直健康地活下去，为我们这个党建立新的制度，都能够有所创造。我现在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是我的身体（思维）还是很好。但愿我的思想将来能够实现。”

爸爸永远没有用红色来标榜过自己。1957年9月9日，在看过夜场电影《桃李劫》后，爸爸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在真正的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生长起真正的党性”……

还是用傅国涌纪念戴煌文章中的这段话来结束我们两女儿的追忆吧：

“……他属于那种老派共产党人，虽然是在共产党的新闻队伍中成长起来，终身也没有抛弃少年时选择的共产主义理想，却有着人道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底色，对事实的尊重，对人类良心的守护……他所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还不是那有形的文字，而是透过他一生特别是后半生的作为所彰显出来的人格力量。在一个铜墙铁壁般的舆论控制国家里，他凭着勇气、正直和长久岁月形成的影响力，尽最大可能地发出正义的人的声音。与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与这个唯上唯权、奴颜婢膝的主流新闻界更是形成了深刻的反差。他是红色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典范，说人话、写真相的典范……”²■

¹ 这段话是2016年1月21日，爸爸在宣武医院病榻上，对来探望他的新四军时期老战友杨连三的外孙丁若然谈的话。丁当时做了录像，是要拿回南京给外公看。

² 《“神化”“特权”今犹在——纪念戴煌先生》，傅国涌，博客中国，傅国涌的专栏，<http://fuguoyong.blogchina.com>，20160708。

【专稿】

戴煌和他的时代

启之

戴老昏睡着，我想给他剪剪手指甲，找来了最快的剪刀，剪不动。那指甲太硬太厚了。戴老醒了，问我《记忆》的事，我不说喝茶停课禁止出国，只说中外学界都在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法国一所高校还跟《记忆》联手，召开研讨会。戴老闭着眼睛，大声说：“不容易！不容易！”

临走时，我给戴老鞠了三个躬。那天是2016年2月2日。

一

戴煌原名澍霖，按家谱，他那辈排到了“霖”字。大哥泽霖，二哥作霖，三哥育霖，四哥雨霖，五姐丰霖，他行六，叫澍霖。澍乃“及时之雨”，“霖”是“连下三日之雨”，戴石屏大概希望这个最小的儿子能够扶危济困，惠民久长吧？

他参加新四军后，喜欢写文章。文章在当地的报纸发表。领导劝他改个名，免得敌人祸害他的亲人——那时候，盐城一带是拉锯区，日本鬼子、国军、新四军、土匪，你走我来，轮流坐桩。澍霖就把名字改成了“煌”。“煌”的本义是“火海似的火炬或篝火”；引申义是“光明”。在他眼里，1944年的中国，就是沉沉黑夜，共产党就是火炬，就是光明。那年，他十六岁。

他妈妈听说了，连说不好：小六子怎么起这么个名字，他是火，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木，火木相克呀！

这话不幸而言中，十三年后，戴煌成了右派，他的哥哥姐姐的儿女都受了连累，“所有的侄子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

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因为这顶帽子，戴家死了三个人。生肺病的姐姐，因为弟弟无法再给她寄钱买雷米封和链霉素，34岁病逝，扔下了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的侄儿，只须二百元的医疗费。可因为他是大右派的侄子，年仅二十岁就死在代课老师的岗位上；最惨的是二哥戴作霖——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理海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不清不楚。不肯带领喊。陈理海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二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领喊了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理海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

陈理海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上的一个五六十斤重、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步，那吊着几十斤重的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39-340页）

二

戴石屏秀才出身，1906年清廷废科举，兴实学。秀才没了出路，戴石屏转学中医。先

在苏北行医，后到沪上，成了药店的坐堂医生。他省吃俭用，几年的功夫攒下了一笔钱，回到家乡阜宁县沟墩镇开了几个前店后厂的铺子，经营南式糕点和中草药。

沟墩镇四面环水，戴家的店铺紧邻水埠头。船家们路过，停船上岸，走上十几步，就可以走进贴着“嘉湖细点”的店门，买上几种戴家的点心；再走上几步就是明济号药店，戴石屏正在那里坐堂。

戴家的糕点铺的师傅会做各种南式糕点，糕类有松子糕、蜜仁糕、桔红糕、绿豆糕、油糕、蜂糕、枣泥拉糕；糖类有酥糖、麻片糖、寸金糖、花生糖；片类有云片糕、椒桃片、松仁片。虽说只是小镇上的一个糕点铺，也足见出南方赏目细点的丰盛。

小六子是糕点铺的小主人，从店铺的后门一进来，先围着大条案转一圈，数数有多少种点心，如果有新花样，就要来吃。吃完了，就钻到条案底下捡铜板——一条案靠墙的一边，上面立着一个竹筒。掌柜的把客人付的铜板随手扔进竹筒，捡拾那些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铜板，就成了小戴煌日课。捡来的铜板并不交公，而是放到小六子自己的口袋里。

离他家店铺不远，石奶奶开了一个馄饨铺，十个铜板一大碗。镇上还有个牛肉铺，专营白水煮牛肉，把煮熟的牛肉切成薄片，浇上自酿的酱油。小六子跟伙伴们玩累了，就领着他们到馄饨铺吃大肉馄饨，或者带他们吃牛肉片。那钱，就是他从糕点铺子地上捡来的。

有一次，正当他和伙伴们大快朵颐的时候，被他四哥发现，四哥揪着他的耳朵，告到了父亲那里。戴石屏没处罚小六子，一是那时候戴家的经济处在上升期，不在乎这几个铜板；二是花钱买吃食，也不算乱发。不过，当父亲的不免担心：这孩子长大了，还不成了及时雨宋公明？

确实，戴煌从小就爱朋友，点心铺里的点心，没少送给小伙伴。跟他玩的，不论贫富，一律平等，点心、馄饨、牛肉同吃共享。

三十年后，他在山西太原当“二劳改”，春节有十五天的假。他的长女戴为伟写过一篇散文，再现了戴煌回北京探亲结束，准备回“劳改营”的情景——

爸开始忙开了。妈拿出平日计算着省下的肉票和攒了一年的钱、全国通用粮票，给了爸。又拿出北京市的面票让爸去买挂面。爸买回肥肉炼了好些大油，冻在大号搪瓷缸子里，准备带回“劳改营”分给那里的难友，还切了许多肉丁和着熬剩的猪油渣做了好些肉炸酱。临走的前一天，爸领我和妹上街买了些纸盒装的北京果脯，看到我和妹眼巴巴咽口水的样子，爸犹豫了一下，给我们小姐俩也称了半斤散装的果脯。

爸提着买的吃食一路走一路说：“为伟，你大了，懂事了，这些是给山西的叔叔伯伯们带的。太原街上商店里什么也没有，我每次回北京，他们都争着给你妈、你们姐儿俩带东西，爸一年在山西，他们经常照顾，经常请爸爸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平时都吃高粱米、玉米面，那东西吃多了屎都拉不出来，爸爸给他们带些吃的、有油水的东西。人要有良心呐，孩子。”（戴为伟《快乐琴和爸爸探亲》载《记忆》44期）

“人要有良心”。大概所有的父母都会这么教育孩子。如果孩子发问：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良心的话？父母们该怎么回答？

三

戴煌所说的良心，首先是恻隐心和感恩心。直到八十岁，戴煌仍旧念念不忘那些同情过他的有恩之人。

他记得，1960年底，他从北大荒回北京，不到三年的苦役，使他的体重从196斤减到82斤，他这个当年的壮汉，在哈尔滨火车站过月台天桥时，硬是双腿打颤，上不了台阶。是管宗祥（北影演员）和阎启明（中央乐团的歌唱演员）扶着他过的桥，又是这两个难友连抬带推把他弄上了火车。（《九死一生》，第231页）

他记得，他当时像个“叫化子”——“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车站派出

所的民警把他叫到办公室盘问，以为他是个“盲流”。而黑龙江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琰不在乎他的这身行头和右派身份，照样陪他到省委招待所食堂吃饭，招呼他住进省委招待所，得知他有两个女儿，还送他小玩具……

他还记得：1965年“五一”过后的一个上午，他突然左腹剧痛，上吐下泻。是劳改所卫生室的大夫苏自田准确的诊断，是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要来了车，把他送进了公安医院，是那位技术高超的医生从他的胰腺管里拉出来一条肥大蛔虫，救了他一命。（266页）

1966年冬季，在清河农场，他腰伤无法动弹，陈德和（修建组的组长兼技师）“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焖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为了让戴煌养腰，陈德和还向指导员于友善说情。于友善果然与人为善，给他派了一个放马的活：“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不愧是于善人。”

同样令他没齿难忘的，是他的妻子潘雪媛受到的善待：1964年4月23日上午，戴煌被抓去劳教。当天下午，怀胎8月的妻子潘雪媛坚持要到看守所给他送衣物——

开车的司机同志叫金永龄，比我小两岁。1956年至1957年，我和一些同志在外交学院专攻外语时，他老开着大轿车在新华社和外交学院之间来回跑。为人极其温和而善良。对我1957年及其后的种种遭遇，他虽然嘴上不便明说，但看得出他在内心中是深藏同情的。这一次，他看着肚子挺得老大的潘雪媛坐稳当了，他才开车。即便在城内平坦的马路上，他心开得很平稳。出了德胜门，路面坑坑洼洼，有一大段路还是车辙交错的泥路，他更开得慢而稳。偶尔车子轻轻地颠簸一下，他都要从车前挡风玻璃内上方的返光镜中扫一眼身旁的潘雪媛，甚怕她出现什么异常感。（257页）

当时戴煌在看守所，他不可能知道金师傅怎么开车。这些事情是他成为“二劳改”，

有了探亲假之后，潘雪媛讲给他的。

让他感激终生的，还有张志奎、苑春林、姚昌淦、徐颖夫妇，还有新华社国内部总编解力夫、《半月谈》的老总闵凡路……这些人并没有惊人之举，他们给予戴煌和他的亲人的，不过是一餐一扶，一瞥一笑。而对于饥寒交迫中的受难者来说，那一餐一扶就是救人一命，就是大慈大悲；那一瞥一笑则可能让走向湖水深处的老舍，停住脚步；可能让准备自缢的傅雷夫妇解下那拴好的绳索；可能会使顾圣婴关上煤气阀门，让全家活下去……。

受到迫害的人特别敏感，他们会注意别人不注意的细枝末节，会从旁人的一个眼神，一个笑脸之中，察觉自己存在的意义。2012年，我采访《董存瑞》的导演郭维时，这位前长影的著名右派告诉我“当时就是有一只狗舔舔我，我也会感动。”文革中的韩美林能活下去，也是因为还有猫狗与他亲近。毛时代常常用“猪狗不如”来比喻解放前的生活。后毛时代可以用“猫狗不如”来比喻毛时代的人情。

戴煌离开北大荒之际，干粮被偷了，饥肠辘辘的他，想求管教干部帮助，看到大吃二喝的人们的嘴脸，他毅然决然地回到零下30度的风雪之中，向几十里外的车站走去。就在这时，850农场一分厂医务室的医生张志奎，在大雪之中，把他找到，拉他回家吃饭，临走还送给他六张救命的烙饼。这一鲜明的对比，让戴煌有了如下感想：

在我们这个本很伟大但已日渐衰微的党内，仍有一些同志矢忠于当年在战火中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始终都铁保着人性，而没有被专制者们的兽性所吞没或叨残，这还能使人们对我们的未来抱着一线之望，但愿日后在我们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中，也能出现这种矢志如初，充分保有人性的人，以重振党的旗鼓与朝气。（《九死一生》第225页）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人性、兽性、专制者。从北大荒到太原的劳改营，戴煌一直生活在人性与兽性之中，也一直在思考着专制主义的问题。他舍不得把党性与人性对立，舍不得把党性与兽性并提，他把矛头指向毛的个人品质，他用有无恻隐之心，来区别人与兽。

恻隐是道德的源头，是重建社会人伦之力量。中国之所以能从纲纪废弛、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走出来，端赖恻隐之心。

四

在打成右派之前，戴煌在新华社几个无话不谈的好友，袁木和王殊排在前面。此二人后来都发达了。王殊官最大，名也最大——当到外交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人称“无冕之王”的外交家。袁木曾任李鹏办公室主任，官至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政协常委，享受正部级待遇。

戴煌成了大右派，对他们的党性和良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新华社动员人们揭批他，袁木从始至终未发一言，未写一字。直到八十岁，戴煌一提起来，还感动不已，连说“不容易！不容易！”可是，这两位好友却没能再续旧谊——一九零年春节，早就调到国务院的袁木回新华社看望大家。在一位老同事家里，袁木给戴煌打电话，说他呆会儿要来戴家。戴煌犹豫了，他知道袁木的名声不好，就举着话筒征询家人的意见：“袁木一会儿要来？”戴煌的长女为伟对着话筒大喊：“别让他来！”电话的那头，袁木知难而退。两位老友至死没有见面。经历过政治风波，听到过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讲话的人，大概十有八九，都会像为伟那样吧？

王殊是江苏常熟人，比戴煌大四岁，他与戴煌既是同乡又是同行，从淮海战役到朝鲜战场，他跟戴煌一样，都是军事记者。在朝鲜，两人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战场上摸爬滚打洗不上澡，时间长了，身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泥垢。实在难受，两人就“干洗”——搓下身上的泥球互掷，取乐。

1972年8月25日，实在走投无路的戴煌，得知王殊出任驻联邦德国的大使。徘徊灯下，犹豫再三，终于给王殊写了一封信：“十年没见了。你和袁杰（王殊的妻子）接到此信时，可能会有多种想法，然而我们过去多年的生死与共，和同志式的相处，使我相信，你们会把它（这封信）看完。”信的末尾说：“我的别后就一言难尽了。谅你亦有所耳闻。

此信不打算详谈，现在有一些难题，拟请能够相互了解的老朋友帮忙解决，不知能否乐助？待复信后，争取面谈，或写封较长的信，向你谈谈别后情况和要求协助解决的具体问题。来信山西太原尖草坪 112 信箱木工组，或北京西单参政胡同七号，我收或潘收均可。”

此信寄出，石沉大海。戴煌到外交部找，王殊不见。这是戴煌第一次求人，他求的是相知甚深的老朋友。王殊不理不见，并不是他真的认为戴煌反党，而是害怕，怕受连累，怕丢官、怕降级……。恐惧心压倒了同情心，革命情压倒了战友情。人性让位于兽性，党性战胜了良心。无数人都有过王殊这样的精神历练。

然而，良心并没有死，清夜扪心，往事历历，同情、愧疚会袭上王殊们的心头。他们知道，这一夜不可能再睡了。他们坐起，开灯，披衣，展信再读，绕室三匝，……。那不死良知在心中翻滚升腾，他们展纸握笔，正要写回信的时候，一个庄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王殊，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一霎间，王殊们被雷击，僵成蜡像。一股“正能量”从那蜡像的头上沛然而下，醍醐灌顶之间，党性从天而降，那一点点的同情和愧疚仓皇逃窜。

“王殊，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崇高的理想，与他们划清界限！”——党性打败了良心，美化了兽性。于是，践踏人伦，丧失人性成了高大尚，王殊们放下了笔，关上了门，心安理得。袁木有三百万字的文集，王殊写过五六本书，上面这些事，他们会写到哪本书里？

八十年代，戴煌改正了，王殊从红旗杂志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携夫人来看戴煌，并且多次请戴煌和他的妻子到他家做客。如果你是戴煌，你去不去？

五

戴煌 10 岁之前，家里的生意红火，他是资本家的小少爷；10 岁到 14 岁，戴家的店铺多次被蒙面土匪光顾，每次都被抢劫一空，他下降为小业主的儿子；14 岁到 16 岁，日本鬼子烧杀掳掠，戴家一落千丈，他成了城镇贫民的子弟。

不管贫富，戴煌都要读他的书，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这些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丑恶社会的鞭笞，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对下层人的同情，随着阅读，溶入了他的生命。

中国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黄飞鸿、方世玉、张三丰的行侠仗义，成了他的人生榜样。

除了看书之外，他还要带着小朋友操练。他在陈桥小学上高小时，就担任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不过，那时候，他家的糕点铺倒闭了，他的衣袋里也没有了铜板，这位团长大人没法用点心、牛肉和馄饨犒劳他的将士了。

戴煌 12 岁那年的冬天，离家出走，参加了新四军——为什么是新四军？因为新四军亲民，扫院子挑水，嘘寒问暖。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凶巴巴的，把老百姓当仇人。他央求一位新四军的连长，让他当兵打鬼子。连长知道他读过私塾，上过高小，就说好，你到我们这儿当个文化教员吧。当晚，戴煌就睡在新四军夺回的日伪炮楼里。听说儿子投了军，当娘的着了急，一大早就由几个婶子嫂子陪着，来到了炮楼前，央求连长让小六子回家。回家后，戴石屏跟这个最小的儿子有一番对话——

你为什么非要当兵走？家里哪儿不好？

家里不干净。

什么？不干净？！

穷亲戚来了，你们爱搭不理。嫌贫爱富就是不干净！

父亲生气了，指吊着腊肉的房梁：那上面干净，把你也吊在那里算了！

戴煌这种想法，在民国时期的知识青年中很有市场。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就是因为余指责她拿他家的钱送给讨饭的。巴金像他母亲一样，对穷人终身抱着同情之心。江青参加革命，也有同样的动机。否则她不会出演王老五之妻。左联五烈士的作品，多是替下层人说话。这是左翼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1944 年，戴煌 16 岁，再一次出走，终于成了新四军中的一员。他热爱这支军队，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而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1947 年春天，他自己作词配曲，写了一首《歌唱领袖毛泽东》的歌曲，这支具有苏北民歌风格的歌儿在苏北传唱。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的时候，他哭了，他祈望毛主席平安。

六

1956年3月，戴煌听到“秘密报告”的传达。对斯大林无限热爱的他，“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从苏联想到中国，从斯大林想到毛泽东，从指导思想想到社会制度。

在回顾反右历史，最让痛心的，是知识分子的表现：“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沉默，没有完成知识分子应负的使命，而把提供新思想、新理论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年轻的大学生。……这是中国大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重要的问题不是由知识分子提出，而是由一些‘半大的孩子’首先思考、首先提出；知识分子的失语、缺席、失职，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的深度。”（《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页127）钱先生不知道，除了他赞许的顾准之外，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比“半大孩子”深刻得多也系统得多的思想理论。¹而戴煌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早在1956年就形成了一整套以反对“神化和特权”为核心的新思想。

1956年3月的一天，上面通知新华社的记者到中南海与毛主席合影。人们欢呼雀跃，更衣整冠。戴煌突然感到索然无味——从那一张张容光焕发的脸上，他读出了与苏联同样的个人迷信，从这种组织的安排之中，他看到了斯大林式的骄矜——他心灰意冷，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同事一再催他回家换衣，他木然相对——他在问自己：这种合影，会给领袖和民众带来什么？要好的同事悄悄地对他说“戴煌，不去不好！”戴煌去了，“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有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到了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前凑。”毛、刘、周、邓小平、彭真在吴冷西的陪同下，来到大家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照完相，“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

¹ 张比在其《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境遇》一文中对比了北大和清华的右派言论：“1957年反右中，北大的右派分子中，以学生右派影响最大，如林昭、谭天荣等。当年5月19日他们贴出一批大字报激烈呼唤民主，尖锐地反对独裁专制，被称为‘519运动’。而清华，则是以教师中右派的思想更为深刻系统，如徐璋本、黄万里、孟昭英、钱伟长等，或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制和一种思想的统治；或在工程建设中主张从实际出发，反对违反科学的长官意志；或在高等教育方面主张通才教育，反对党委体制、外行领导内行。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从‘右’的方面修正现行体制，是知识界追求科学民主的重要思想资源。”载《记忆》186期，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专辑（一）。

席等领导人离去，我始终绷着脸，没笑过。”“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那一年年底，他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把社会主义民主、神化个人、特权阶级、人道主义等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

2016年2月25日，新华社在八宝山竹厅举办戴煌的遗体告别。竹厅内外，花圈如林；我想找地方把挽幛和和挽联挂上，新华社派来的年轻人横拦竖挡，而以戴老的女婿最为恶声恶气。我好说歹说，勉强把北大老五届的挽联挂在花圈上，剩下的女附中的挽联和《记忆》的挽幛无处可挂，只好请地质学院的老师朱德瑜和我踮脚高举，人群涌来，相机如林。远处一辆警车驶来……

竹厅正中，戴煌躺在灵床上，身上盖着锤子镰刀的党旗。■

2017-3-10

附：追悼会挽词

恭挽戴煌先生灵右

抗日驱蒋 赴朝鲜访越南 先知先觉批领袖神化

揭干部特权 三次受骗 皆因几句真话

北大荒成了死亡场 天安门连着劳改营

妻离子散亲友株连 慈母临终想儿子落泪襟前

十年劫国家罹难 预见不幸言中

挥毫执管 上甘肃下福建 理乱拨正 为九莲奔走

替黔首鸣冤 百般调研 仅凭一颗良心

新华社下了改正令 无冕王心系中兴梦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孝子舍命为真理坐穿牢底
两头真志士扼腕 啼血犹唤东风

《记忆》全体同仁敬挽 丙申正月十五日

敬爱的戴煌先生千古

刚肠谔谔，岂料引蛇出洞。
铁骨铮铮，何惧惹火烧身。

晚生：

刘 进 于 羚

宋彬彬 朱晓茵

陈 琨 罗 治

郝新平 黄光光

叶维丽 李红云

郭小林 冯敬兰

牛 力

敬挽

2016年2月20日

戴煌先生千古

以先知之明 明察神化之恶果

受苦受难二十二载

持理想之光 光曝特权之成因

不屈不挠八十八年

北京大学：

胡宗式、章 铎

张橙华、陆水林

刘淑君、尹占河

官香正、王复兴

敬挽

痛悼戴煌老前辈

新闻界道德良心又添一灵位

故园间公平正义且待满天雷

晚辈谢小玲敬挽

2016 年 2 月 22 日

敬挽回戴老

两头真说你是新闻界的良心，笔底波澜，彰人性之光，
五毛党视你为改革派的头脑，文章光彩，显平庸之恶。

佚名敬挽

七律一首并序

启之

丙申正月十二，戴煌先生长逝于北京宣武医院九楼病室。谨赋小诗，以志纪念。

少年从军为家国，
救星竟是老大哥。
一腔热血入冤海，
廿载苦役古拉格。
耀邦平反惊天下，
九莲死生动山河。
最怜榻前书咄咄，
字字直指老妖魔。■

【戴煌遗作选】

我应终生牢记这两种人

戴煌

人老了，总要回想回想过去值得记忆的事。回想1944年夏天我入党之后，面对“全党办报”的号召，我觉得自己既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响应这个召唤。虽然当时身在文工团，也经常给所在地区的报纸杂志写稿。新闻战线的老前辈们谆谆教导说：给共产党的报刊杂志写稿，要牢牢记住“讲真话”这个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史实讲真话”。几十年来，可以说，我一直按照这个原则精神办事。在“反右”之后的党内会议上，我也照样提出警惕“神化与特权”等论点，从而被打成了“右派”，蒙受了二十多年的人生磨难。

在这个磨难之前及其以后的岁月中，我觉得我应终生牢记这两种人。

哪两种人？按我这年近八旬的老头儿的说法，即理想的人和颇不理想的人。

先说这后一种。

1949年4月20号，三野八兵团三十四军的一支部队攻占了蒋匪帮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十二圩之后的一天夜晚，我当时是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的记者，随军登船准备强渡长江，对岸是镇江偏西的高资一带。正在这时，从南京方向向长江口奔逃的一艘敌舰，慌里慌张地向我们身后的炮兵阵地开炮，我们的炮兵也连忙发出阵阵排炮。而敌舰打出的机关炮一发连着一发，一连串炮弹在空中架起一座长虹形的半圆，活像一串红灯笼向北岸我方的炮兵阵地飞去，落地时咣咣响地发出闪闪青光。已登船的一些原籍北方不识水性的战士惊慌失措地大叫“原子弹”，急忙纷纷下船隐蔽。这样，我们在高资一带登陆以后，岸上的敌人早已逃之夭夭，除了被我们的炮兵打得稀巴烂的残破铁丝网和一些尚未被炸毁的地雷外，我们什么危险也没有遇到。但是随我的通讯员，在北岸的慌乱中不知去向。我继续跟随那个突击营爬山越岭，插向京杭国道上的句容县城，想在那一带阻击向杭州逃窜的南京伪中

央政府的军警人员。但当我们到达句容时，他们早已逃得不见踪影。呆了一天，我急于要发出已写好的新闻与通讯。但通讯员还没回来，所在的这个营也不知军部在何处，他们也没法派人帮我把这些稿件送到与军部在一起的支社电台。我很担心这些稿件失去时效，十分焦急。恰巧另一个团也在句容附近。这个团的政治处主任老钱，也急于向军部汇报一些情况。他听说攻打南京时，三十四军的侦察营也参加了，说不定军部就在南京。他遂建议我随他同乘一辆被奔逃的敌人掳掠来句容而丢弃的一辆民营大卡车去南京。

这样，我们就一齐到了南京。这时，南京已完全解放，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均已平安无事。我们在街上寻找军部时，在新街口西北方向的伪《中央日报》门前的贴报栏上，贴有《解放新闻》，上面刊载的基本上都是新华社电头的稿件，也有少量南京解放后的动态新闻。我们觉得很奇怪：《中央日报》留下来的人怎么转变得这么快？连忙进门想问个明白。这一问，反而使我们很兴奋：原来是战斗在《中央日报》记者部的我方地下党员李廉等人，奉南京市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女）之命，利用《中央日报》未及拆逃的机器、纸张和人员，临时办起了这张报纸，等待我们军队或解放区的报纸来接收。

当时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也有一定的警惕性，但是老钱是个参加革命早几年的老同志，已二十七岁，据他的目光所及，他觉得这肯定是我们的地下党同志。当时除李廉外，还有地下党的候补党员魏文华（山东人，后去新华社江苏分社和山东分社），还有中央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邵燕平（后改为邵平，现已离休在南京）。如此说来，我也颇为相信和兴奋。我问李廉（现在是南京大学的离休教授，仍健在）有无办法帮我向北平总社发稿。他说他们的电台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南京市电报局也无法发稿。为了不失时效，他说干脆在他们的《解放新闻》上登一登。老钱也在一旁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我就把稿件交给了李廉。谁知道，第二天见报后，我才发现李廉特别在我的那篇通讯后面加了个“新华社前线记者戴煌”的头衔。他是地下党，这也难怪。

但是，这可惹了大麻烦。因为没有总社播发，是不能加“新华社记者”头衔的。而在

那时，又正是强调“加强纪律性”的时候。在这关键时刻，八兵团分社刚刚进了城。分社副社长李扬立即抓住这件事，通过三野总分社向总社和中宣部发了一个简报，说我与“伪《中央日报》改头换面的《解放新闻》”发生了关系，大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比我大十几岁，参加革命比我早。但他过去干过什么，我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更无从知道。可是这一来，总社和中宣部立即向全党全军发了个通报，把这个和“伪《中央日报》改头换面的《解放新闻》”发生了关系的大帽子硬扣在我头上。

可是，李扬将总社和中宣部根据他的简报而发给全党全军的通报一直向自己分社的同志保密，连分社的采访主任——从上饶集中营拼死逃出来的季音都不知道（季音离休前是《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仍健在）。他的目的何在，更让人莫测。

几天后，他就停止我在南京一些院校的采访，唤我急回已到中山门外孝陵卫的三十四军军部。这时我才得知总社和中宣部的这个夸大其辞、变了质的通报。随后三十四军党委不听我的解释，硬给我以“党内当众警告、行政撤销记者职务”的处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再三向中央证明缘由也无济于事。老实说，当年我才21岁，也很有点青年火气。我想1943年夏天和1945年春天，我也被日本鬼子追杀过两次，1947年夏天攻打盐城时，比我年长的苏北前线支社记者胡捷同志随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的突击队爬城墙时，身中数弹，抢救时牺牲在担架上。我也随攻打北门外土围子的廖成美（即后来我们安徽分社社长，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宣奉华的堂姐夫）旅的突击队和敌人拼过刺刀。我的敌情观念并不比别人差，为什么要把“敌我不分”的臭帽子硬扣在我的头上？

再说，人家南京市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开辟第二条战线立下大功的人。她就是领导过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行动的人，毛泽东在事发10天后都写过《蒋介石已处于全民包围》的文章，高度赞扬这次运动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怎么现在突然说话不算数了？这显然是一味强调“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轻视工人、知识分子革命者和地下党的行为。我很不以为然。因此，在三十四军兼南京警备部队政治部的支部大会上，我提出退党，觉得这样的党很不实事求是。政

治部秘书科长等少数人同意让我退出，但绝大多数同志都劝我息熄火气，耐心等待，问题总会水落石出的，他们要我继续留在党内。这样，我才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

当年冬天，由于我白天采访，连夜写了个将近6000字的报告文学，经三野总分社发稿，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等和部队的许多报纸纷纷刊登，三十四军政治部还出了个小册子，向本部队各师团营连排广为发行。三十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就说我受了处分后表现得很好，恢复了我的记者职务。但“党内当众警告”的处分还继续保留。以后我每次填表，都在表上受何奖励或处分的栏内，憋着气填上因何受过党内当众警告处分这几个字。

不但如此，在1957年号召大家对党提意见时，明明再三表白是“知言不尽，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说是“阳谋”，把50几万人都打成了“右派”，这算是什么问题？到后来还说什么“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那么，就算留了几个样板算是“正确的”根据，那么“扩大”了11万多倍还算是“扩大化”？国内部支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的所谓“右派结论”时，居然在第一页的右上角还再提一次《解放新闻》的事，似乎想说明我早就受过党的处分；而且在“反右”时，新华社说我是“右派”的长达3000字的新闻中，还说什么我1949年一进入南京，就滋生了“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真叫人有口难言。

这是一。

还有人，在胡耀邦同志刚去世时，明明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向全国发表了悼念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的“六四”前夕，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阻拦大家上街游行。再以后，我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后半部时，竟然阻挠我到值班室去复印广泛核实和征求意见的章节，同时不给我开继续采访的介绍信。我转而希望原来在国内部的记者、后到总编室当副总编辑的人给我开张总编室的介绍信，他同样给我回了个拂袖之答。这些，我很不以为然。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些人毫无正义革命之感。

80年代中后期担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的人，率团参加越南河内召开的“亚洲通讯社社

长会议”。作为东道主，越南通讯社社长陶松在欢迎大家的宴会上，请中国代表团的这位团长回国后向我代问好；然后，陶松又专门宴请中国代表团，再次请这位中国代表团的这位团长回国后向我代问好。因为1954年和1955年春天，我也在越南采访过，参加过奠边府的决战和法越当地的停战军事谈判会议。那时，陶松是越南通讯社的采编主任，和我朝夕相处，而且感情十分投合，所以他此次再三请这位团长向我问好。但是，这位团长不知是何心思，回国后竟一直隐而不宣，守口如瓶。后来直到我楼下的一位邻居，当年也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一起乘坐电梯时，同我闲谈起这档子事，我才知道陶松对我的问候，并对那位惜字如金的团长，心存疑惑。回想1957年“反右”时，他极其狂热地攻击我，这虽然不对，但那毕竟早已过去了。时至今日，何必还如此待我？

正是这样的人，还做了一件同样令人纳闷的事。有一次，越南邀请抗法、抗美战争年代驻过越南的新华社记者回访越南。回访人员中正是这个人担任回访团团长，而他是在越法停战前夕才去越南的，而我这个参加过枪林弹雨的越法最后决战——奠边府战役——的人却没有，也没有后来曾做过河内分社社长的王唯真。后来王唯真向我提及此事，我才惊闻，不禁十分诧异。这又是为什么？

还有一些“人云亦云”的令人不快的事，我就不去一一细数了。现在，我得说说新华社内很多很够理想的好同志。

比如：陶国栋，原来是海防前线分社的机要员，后调黑龙江分社，我们在1960年冬天之前从未见过面。只是有一度要打台湾，派我到海防前线分社去，并到南京军区开好了在沿海各部队的采访介绍信，可能那时他就知道有我这个人。后来我被打成了“右派”，大概看了新华社的报道和我们内部的《前进报》上的消息，他就更知道我这个人了。1960年冬天，我从北大荒被强迫劳动的地方回北京，第一个先到哈尔滨，想见见也在北大荒劳动过、比我先回一步的同志，就在黑龙江分社停留了几天。陶国栋同志竟像老战友一样地亲近我，连续多次陪我到省委食堂就餐，同时在北方的严寒天里十分关心我的冷暖，根本无视戴在我头上的“右派”帽子。这使我很感动。后来他调到湖北分社当记者，我们还通过

几次话。再以后由于工作繁忙和老来多病，互相问候的电话就越来越少了。但这种友情我一直铭记在胸。

又如康国志、王文珽夫妇，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很仁慈、很良善的人。1960年冬天从北大荒返京，我经过哈尔滨站，特到吉林分社去看望他们。康国志不仅把我这个破衣烂裳的人安排到省委招待所吃住，临别时，他们夫妇又特地买了许多小玩意儿，让我带给我的两个小女儿。后来老康从吉林分社调到新疆分社又调回总社人事局当局长，一直与我相处甚好。

还有，像闵凡路同志，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文质彬彬和知情达理的人。他从《半月谈》总编辑调任国内部主任后，仍然终日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我离休后，根据早已积累的资料和新的采写企望撰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凭一腔正义支持我这样做。他不仅让办公室给我开许多采访介绍信，而且让会计室给我实报实销所有采访费用。到值班室去复印核实和征求意见稿，更是一路大开绿灯。他到了年龄离开国内部时，我这部书稿才完成了一半。国内部主任换了另一种人，我的工作立即大受阻挠，这在上面已说过。这不能不使我回想起闵凡路同志对正义事业的积极热心的支持，更加觉得其难能可贵。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新华社为一些“右倾”同志平反，并要给我这个“右派”作为全社“右派”的第一个“甄别”。后来下来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打退单干风”的指示，社内领导组织的有关人立刻就来了个截然相反，在1963年对我进行了“再批判”；1964年4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开除了我的公职，送我劳教两年。两年到期时，适逢文化大革命，社里的头儿们都戴着高帽子游街，没人再管我的事了。劳改农场就对我进行“留场就业”二劳改。这一改就是很多年。1975年，我看到报纸上刊登解力夫同志被选为人大常委。我想他已从国外记者岗位上回国了。因为他和他的爱人冯光同志是我在外交学院攻读英文时的同学。就凭这，我给他俩写了封信，说说长期劳改使妻儿受苦的窘境，希望他们能够主持正义，帮我搞一条新的出路。这时解力夫大概是社里总编室的负责人，他居然立即向社领导提议让我回归新华社。这使这位领导很为难。其回

答的大意是：如果让戴煌回来，那么滞留在五七干校的同志怎么办？听了这种回答，解力夫虽然没再坚持下去，但凭着大义凛然的勇气，说明他对“反右”这样的运动早就有一定的正确看法。所以，我就他们的这种举动认识到，他们对我的正义慨助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曾一度同学英文，而是在政见上有着共同的认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一直感铭在心。

而且，在我“改正”回社重操旧业之后，虽然恢复了原有待遇，同时也时有少许稿费收入，家庭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支援外地许多新旧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贫困学生和没按政策办理的一直贫苦的高山野谷的民办教师等等，我的经济生活仍很紧张，“改正”后好多年还买不起洗衣机。大约在我离休的1991年前后，解力夫同志大概凭他连续出版了人类战祸魁首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书而获得若干版税，他们夫妇特地送来1000元，让我和贫苦之妻潘京荣购买洗衣机等，以缓解家中老少劳顿之苦。这以后，我虽然也出了几本书，也拿到过少许版税，我一直没有答谢过老解、冯光夫妇，而是继续支援前述那类受苦人。我想他们是能够理解并支持我这样做的。

从此，老解和冯光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一直与我常来常往，相互关怀。

再有，姚昌淦同志和他在《光明日报》离休的老伴徐颖同志。老姚，过去在中南总分社和湖北分社，对我只知其名。1956年夏秋之间，总社调来一些同志送外交学院代训班学习英文准备派出国，他也是被调来总社的人员之一，这样我们才经常见面。后来，他还带着与他相恋的《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同志一起到我家里来，谈得很投机。1957年我因警惕“神化和特权”的一些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而且硬说与我同在解放军分社又比较谈得来的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是什么“右派小集团”。由于姚昌淦同志与这些人从未来往过，就污蔑他是“小集团”之外由我“直线领导”的“右派”。恰恰这时，徐颖同志在大鸣大放期间，奉命在《光明日报》上报道过一些专家教授的鸣放意见也被打成了“右派”，并且在1958年春天与很多同志和我一起到北大荒劳动过。将近三年后，我从北大荒回来在国内部资料组工作时，姚昌淦等人也从唐山附近的柏各庄农场回来。不久，他和徐颖等一大批人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从事教书等工作。后来我又被劳教和二劳改，

工资收入少得可怜。我后来的妻子潘京荣在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工厂当会计，后又说她是“右派”的小老婆，把她放到怀孕的妇女都要调出去的喷漆车间罚苦工，每月工资只 25 元。我和她生有两个女孩，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姚昌淦和徐颖同志这时虽然比我们稍好一些，但他们也是被降了级、大大减少了收入，而且也有一双儿女，身边还有一位老人，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们仍三十、二十地不时接济我们。这种舍己救人的情义和人性之道，使我终身难忘……

要说的好同志还有很多，一一道来必会篇幅太长，我只好就此打住。但就我而言，我们同一个党内，为什么会有理想的人和不够理想的人之分？这使我想起了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回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同志和先烈，确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但是在这同时，也确有另外一种人是带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和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称王称霸的贪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这样，在同一个共产党内，必有合乎理想的人和颇不理想的人之分。请诸位细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

完稿于 2006 年五一黄金周

【评 论】

我所遇到的“阶级斗争”

戴 煌

—

1947年秋，苏北敌后极个别比较中心的地区，也搞土地改革。那时，我刚当记者不久，路过阜东县（即原是阜宁县的东部，后与滨海县合并，叫滨海县）的一个村庄，正逢这个村庄开批斗会。

站在众乡亲面前的是一群少妇或大姑娘，想来一定是村子里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儿媳。只见一些“土改根子”、积极分子和村干部，各抱着一只吱哇乱叫的小猫走上前去，勒令这些年轻的女子解开各自的裤带，敞开裤腰，把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猫塞进她们的裤裆，接着又亲手把她们的裤带勒紧，并扎好她们的两条裤腿，不准她们自己松扣而把小猫拎出来。这使得那些小猫在那几位女子的裤裆里乱抓乱咬，疼得那几位年轻妇女满脸羞愧地摇摆直跳，大喊“救命”。有的乡亲，尤其是妇女，只能用双手遮住自己的双眼，而那些放猫的人和一些村干部却哈哈大笑。

我因从部队采访回来，只在那儿临时路过，既不知道那村庄的名字，也不认识那村子里的任何党员和干部，所以当时没说什么话，只是憋足一肚子气。回到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政治部，我就大骂这种人没有人性，是畜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什么叫“革命”。同时认为这是一群野兽，极端野蛮和卑鄙，与“革命斗争”根本沾不上边；这是侮辱和破坏了“土改路线”。就是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家的儿媳妇、大姑娘，她们又何罪之有？为什么要这样作践她们、侮辱她们？这叫“阶级分明、立场坚定”？

看我这样气愤，大发议论，政治部宣教科宣教科科长兼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社长张牧，连忙将一只指头竖挡在自己的唇边，悄悄地说：“小六子住口，不要再说一句话！”

因为我在家排行最小，上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所以小名叫“戴小六子”，参加新四军后，有些年龄比我大几岁的人，有时开玩笑，也叫我“小六子”。张牧当时27岁，比我大八岁，而且又是有名的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想来他目睹的极“左”行为比我多得多，而且往往是“上面”有权的人才喜欢这样做，还叫做“立场坚定”，所以才叫我不要再发宏论，免得惹来一身祸，吃不了兜着走。

听他这一说，我只好不再吭声，但内心中一直耿耿于怀，难以想得通！

二

建国以后，更有很多年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单是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

“与人斗，其乐无穷”，就使人刻骨铭心地永远难忘。

1969年春天，我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火车站附近的清河劳改农场潮白河以西582分场“右派”小队。劳改农场遵奉“上峰”指示，对农场刑满释放和劳教期满而留场就业人员——俗称“二劳改”——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结果，凡是贪官污吏、小偷流氓、盗墓贼、强奸犯、经商或行医时的骗子手等等的社会渣滓，都被划成了“内矛”；而所有的“右派”，包括我这样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敌人拼过刺刀，只在“反右”已开始之后的党内整风鸣放会上提了警惕“神化和特权”的人，都被划为“敌矛”。我们和所有被划成“敌矛”的人都排成队，观看那些被划为“内矛”的人成群结队地摇旗呐喊，耀武扬威。

这种黑白混淆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说到底，大概就看你对现政权中的极权统治是否有不同的观点，这观点是否对极权统治构成威胁。这些被划为“内矛”的人，尽管是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对“极权”无妨大碍，所以也可以划为“内矛”，叫做“团结大多数”。可是，这将导致全社会的道德良知愈加前行与臻善，还是倒退与溃灭？这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全社会几乎毫无诚信可言，恐怕与此不无关系。这是正如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在其《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风大浪，摧残了无数英灵，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上册第432页）

三

这是不是也涉及到有关的人？我心存疑惑。我后来读到一本32开小书，只有47页，是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书名为《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出版。大家都知道，邓小平那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之一，是中央总书记，又是中央整风“反右”的五人小组组长。他一上来就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重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否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他接着又说：“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

是这样吗？就拿我这个“右派”分子来说，我压根儿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相反我坚决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维护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神圣的目的，在革命战争中都不顾个人的生死，经常身临最前线，而只是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反右”斗争已蓬勃开展之后的党内会议上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打和压，而根本不是什么“辩论”和“说服”，这完全是“极权主义”和“封建主义”，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嘴上说得好听，挂羊头买狗肉罢了。

此外，就拿“合作化”、“统购统销”、当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政策来说，今天又怎么样？在这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过去180度大转弯的社会中，那些都成了历史陈迹了，而且有的正是邓小平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大刀阔斧地换了另一副面孔。

当时他还说：“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报告的第八节“改进工作，争取全胜”中，他只是泛泛地说什么“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等等，根本没接触到我所说的“神化和特权”的意思，真令人惋惜！

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是为了应付“最高”，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后来看到1994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内收有1938年至1965年“经作者同意”出版的43篇著作，才使人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我在1957年的3篇作品中，只见到4月8日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和《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同年5月15日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而没有同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说明，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两次磨难后，他已认识到这篇讲话的许多见解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或者是当年以“最高”的精神应付“场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要把这篇讲话交给历史了。同时，也说明他根本不愿意在“文选”中自造矛盾，从而与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吻合的。

这也可以说明，他又与那个“王朝”划清界线了，正像有人评说隋炀帝那样：“其辩足以拒谏，其才足以饰非”，就是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面子，享尽了个人的愉悦之情，重用了一些不三不四之徒残害了忠勇之士，最终使尽了“帝王术”而毁灭了帝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和许多人的惨痛记忆。■

2006年9月26日下午于京

【评论】

我为何常常赞念这两句话

戴煌

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曾赞佩过陶行知先生的这两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这是1930年，陶行知先生在给他南京晓庄师范毕业后去淮安新安小学当教员的汪达之¹

¹ 不久，汪达之成了新安小学校长。1935年，他组织了“新安旅行团”，团员们就是这个学校的7个学生。他们的足迹

的信中写的，大概是表明他和他的同仁们都是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尽心服务，绝不会为个人捞取半根稻草的心意吧。

这两句话，使我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的许多社会党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同志和先烈，他们确实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真正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全人类民主、自由、幸福的伟大崇高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他们确实是人间的楷模。自从听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国在实行了一连串的“运动”之后，我才逐渐地醒悟到在上述这些好同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抱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的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的。时至今日，层层级级的贪官污吏仍然多如牛毛。这种人，一旦窃取到党国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大权，必然是他们一个人说了算，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式的极权专制统治，毫无民主可言。

早在1843年，即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也是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办《德法年鉴》的年仅25岁的马克思，在外游览考察行至科仑时，给《德法年鉴》中的卢格的信中就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¹

马恩晚年，虽然与时俱进地改变了《共产党宣言》中暴力社会主义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的许多观点，但他们青年时期的许多观点还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关于“专制制度”的这句话，虽然当时只是针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但时至今日，仍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为什么常常赞念陶行知先生的这两句话并联想到马克思关于“专制制度”的论断？这是因为有无数事实使我不能不这样想。

首先，在我们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真的“伟大”么？他真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么？不，他完全是个大骗子、

踏遍了全国很多省市，边旅行演出，边扩招团员，1941年到达苏北新四军地区，是个全国知名的团体。

¹ 马克思的这句话，详见于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

大流氓，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就与“伟大”二字风马牛不相及了。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他是个完完全全的怀着帝王野心假借“革命”的名义，爬到帝王宝座上去的。不说别的，单说他在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哪一样不是为了维护和保障他的帝王之尊不容破损其边角皮毛？有哪一样真是为了“人民”？他骗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影儿么？各民主党派为什么曾一度销声匿迹？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他都可以将其迫害致死，就连国家宪法和建国前夕各民主党派联合制定的《共同纲领》他都说踩到脚下就踩到脚下……一切的一切，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完全成了天下的皇帝和太上皇，或中华大地的玉皇大帝。正如他自己“金口玉言”说的，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即套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实施秦始皇的专制本质，故而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还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自己做到了么？不单是他在全国各地建造的几十座行宫别墅，其数量之多和堂皇豪华就远远超过全世界的古今帝王，有的更应被列为世界之最。其中北戴河的、杭州西湖之畔刘庄的、以及他的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等等，竟是在“三年灾害”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哀鸿遍野的惨境下动辄耗资成亿元造起来的，这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他的帝王之尊？

再拿他的一些诗词来说，那也是只能骗人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于永久。像《沁园春·雪》，曾一度迷惑住著名的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特别是当时在他参与编辑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之后，轰动了整个蒋统区。建国后，吴祖光更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但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他气愤得大骂毛泽东为“毛贼”，并且声嘶力竭地提议把“毛贼”的像“赶快从天安门上拿下来”。这是在一个会议上他当众提出来的。

这“毛贼”的帽子大而重么？不，一点儿也不。就拿他答谢李淑一的《蝶恋花》来说，他一上来就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开慧真是他的“骄杨”么？不，这也是完完全全骗人的鬼话。1927年，他上了井冈山之后，杨开慧在长沙抚养毛岸英、毛岸青还是好好的，1928年夏天，他就和贺子珍睡在一起了，1929年就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又隔一年多——1930

年冬天，杨开慧才死于湖南军阀何健之手。这叫“骄杨”么？期间两度攻打长沙，他为何不把“骄杨”接上井冈山？

1938年，贺子珍去莫斯科治病休息。贺子珍前脚刚走，毛泽东后脚就和江青睡在一起了，这真叫“快马加鞭”——决不丧失男女之间床上“卿卿我我”的点滴时间。建国之后，他究竟仗着威势和多少女人上过床，谁也说不清，至少比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长征结束后，他写的词中曾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两句。在征求意见时，彭德怀曾真诚地把后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或“唯我红军士兵”，而毛泽东仍用“唯我彭大将军”，好像他对彭大将军特别器重。可是在抗日战争中期，彭大将军搞了个“百团大战”，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发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实际上，他对百团大战并不满意。既然有毛泽东的高度评论，在多次受批判时，发动百团大战为何竟成了彭德怀的一大罪名？这不难理解，除了毛泽东自己，谁敢出来反对他对百团大战最初的评价？毛泽东所担心的，不正是过早暴露共产党、八路军的军事实力，引起日寇和蒋介石的重视，影响他以抗日之名暗蓄力量以备与蒋介石争夺谁为中华魁首的帝王之权的野心吗？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只是对“大跃进”提了点意见，这更触犯了毛泽东的帝王之尊，立即把“彭大将军”以及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大将、遵义会议后也当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以及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打成了“反党”的“右倾机会分子”，并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反右倾”运动，“揪”出了几百万“右倾分子”，使全国已经出现饿殍惨相的“三面红旗”运动继续“向前大跃进”，使全国“三年灾害”无辜饿死几千万人，比整个八年抗战战死、累死、饿死的总数三千多万还要多得多。这还叫什么“唯我彭大将军”？而且和刘少奇一样，“彭大将军”在“文革”中也被迫害致死！

而且为了掩盖这些千古大罪，他从不下任何形式的“罪己诏”，而且对“成绩和缺点”之比永远“牢不可破”的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并在1959年回到韶山时还写了一首

诗，说什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来冲淡韶山乡亲在他面前实说大饥荒饿肚肠的凄凉情景。

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展览他的破睡衣、破拖鞋等等以吹嘘他如何艰苦朴素、勤俭度日等等，那更是欺人之谈。试问：他就是节约了上亿元，那也是他自己的，与国家与人民有何相干？那么多的行宫别墅，都是人民的血汗巨资，岂是他的一两件破睡衣、一两双破拖鞋能够相比的？再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出书、写稿子都不能拿到一丝一毫的稿费，而独独只有他风行全国全世界的几千万、几亿册的“毛选”和诗词的稿费、出版税等等照拿不误，这又等于多少睡衣和拖鞋？

所以，对他的诗词、“毛选”等等，我们都应该剥开虚假的“革命”外衣，脚踏实地地看看实质，切切不可上当。至于在这种“极权专制制度”下的各级官吏“特权”的泛滥，更是多而广之无其数，层出不穷。单是这些年以旅游、外贸等多种多样的虚名迁逃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贪官污吏害人虫就成千上万，每人偷带和倒汇出去的外币折成人民币都上亿元，这比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其贪官污吏都没有如此广泛和嚣张，这还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党？

应该承认，在争夺帝王宝座的过程中，他真是“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其神机妙算确在蒋介石之上，骗人的诡计和战略战术确是首屈一指，然而这只是为了他“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¹，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争夺和维护帝王之尊。总之，任何人都不可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那样，人们迟早总会看透“皇帝的新衣”。

“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原来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据杨继绳先生最新力作《墓碑》的手稿记述，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下列一

¹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读书期间，他写过一首《咏蛙》诗。其诗就是：“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请见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星期天》刊发的署名为张湘藩辑介的《毛泽东〈咏蛙〉诗》。同年5月5日，同一个《中国青年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我国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同志的《评毛泽东〈咏蛙〉诗》，字里行间就表示出他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帝王思想。

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这只是草草地谈几点大家一说了然的事，更多更深的事例就不多说了，免得耽误各位过多的时间，而且凭这两百字一张的小稿纸，也不是多写几十张就能够写完的。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亮明身世进行实事求是地讨论。■

2008年1月10日于亦庄

【评 论】

蒋介石解决陆铿的问题及引发的联想

戴 煌

—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这使我们很纳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我们的口头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怎么也骂起宋子文、孔祥熙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百思莫解，只有把这当作一个谜，待日后再探究吧！

1949年4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我从《中央日报》我方地下党的同志和一些想方设法坚决留在大陆而拒去台湾的报社工作人员口中，才摸清了这档子事的原原委委。

原来那时《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是个直性子，外号“大声”。他曾受肖乾引导，做了新闻工作。他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和“新闻第一”。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当年5月，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素有“黄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政员黄宇人为此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惊得与会参政员都面面相觑。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开口闭口都是“最高当局”的“意思”和“指示”如何如何，驴头不对马嘴。这使得当时在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连夜派人将原件送还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就刊出了那样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中外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大耍美女之威风，一定要蒋介石追究责任，否则就和他离婚。

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紧急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泼口大骂“娘希×”，一定要追究责任。同时，老蒋和他的“智囊”们还作了各种分析研究：这是个人的职业冲动，还是政治图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共产党人在其中捣乱？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奉命当过汉奸）判断：可能是尾大不掉的陆铿等人的职业冲动而胡干的。但老蒋不相信，决定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经过两次谈话，陆铿坚决表示新闻记者有不泄露消息来源的义务，并说这是必须遵守的信条。至于发表这消息的动机，完全是为国民党着想，而不是使国民党更坏。至于蒋介石说什么他是“总裁”，陆铿是党员，他以“总裁”的身份命令陆铿立即讲出消息来源，陆铿回答的是：“那好，我马上退出国民党。”

这两次交谈后，陆铿接着就打起了小包袱，准备坐牢。8月2日听说李惟果驾车来到《中央日报》楼下，陆铿即拎着包袱下楼。李惟果一见这模样，就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准备坐牢。李惟果说：“瞎说！总裁要亲自问问你！”

李惟果边说，边把陆铿拉上汽车，直开黄埔路的“官邸”。蒋介石见了陆铿第一句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

陆铿说：“能不能让我多说两句？”

老蒋很不耐烦，但也没说“不可”。于是陆铿就将自己见到的国民党多种腐败现象脱口而出，特别把他在豫北采访王仲廉部的亲身感受，详详细细地和盘尽托。他说前方士兵艰苦作战时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为国家没钱给他们买水壶；而后方的官僚们却穷奢极侈，国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报》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员，正表示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说了一些“捧场”的话。

陆铿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要求蒋介石给予处分，李惟果马上站起来说：“报告总裁：惟果负责宣传部，有负总裁嘱托之重，请求给惟果处分。”蒋介石脸上的怒气全消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竟连着说：“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

于是，这场闹剧就此关门拉倒。

事后，陆铿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获悉：原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跟蒋介石谈话时，无意中谈到这件事，竟赞扬这是“民主的表现”。老蒋听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并以此说服了宋美龄。

对蒋介石，人们是十分憎恨的，因为他杀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特别令人发指的是：1927年7月4日夜，在上海龙华刑场，用刀斧手们砍杀了陈独秀同志的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当刀斧手们要陈延年跪下时，陈延年傲然屹立地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一拥而上，拼命把陈延年往下按，快举刀时，陈延年一跃而起。如是反复再三，刽子手们只好放弃了迫其下跪就戮的努力，只得用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随之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遗体剁成数块！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严令不准收尸。如今连日本侵略中国的“皇军”中，也有极个别良心发现者，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或北京卢沟桥抗日纪念馆下跪求饶，可是蒋介石及其众多的刽子手们，有一个悔罪的么？

同样，时至今日，中国大陆残杀张志新、遇罗克等烈士的、号称“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有一个悔罪的么？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再说，如此罪恶滔天的蒋光头，也在“民主”的遮羞布下网开一面，饶恕了陆铿。陆铿离开了国民党。1957年大陆“整风鸣放”，他也提了一些意见，结果说他反党和攻击“老大哥”，在共产党的政权下坐了18年牢。刑满释放后，他去了香港，与人合伙办起了《百姓》半月刊；1985年还来到北京，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如果在林彪、陈伯达“红火”时，咱们的《人民日报》也有类似陆铿这样的人出于职业的冲动，说林、陈是贪官污吏，会有何“最高指示”？或者在“四人帮”横行时，有人把其中的任何两个人说成是政治投机分子，“最高指示”又会如何？即使“最高”一声不吭，那末残杀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刽子手们，也会主动根据《公安六条》的铁板原则，把这种人先残杀了再说。因为这不仅是他们的“铁饭碗”，而且能“立大功”、“升大官”、“发大财”，管它正义不正义！因为他们最大的人生情欲就是“高人一筹”，距离“革命”二字十万八千里。你说是不是？■

（定稿于2006年9月25日于京）

【述 往】

检讨我参加的“肃反”工作

戴 煌

人老了，回首经年往事，想想自己的一生，起起伏伏，九死一生。一些人和事经常显现脑海，想得多了，竟也有些愧疚挥之不去。虽然有些人做过很对不起我的事，但我自己也有两件事对不起旁人。古云：“己不正，焉能正人？”我先来检讨一下自己。

1956年春天，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之前，我也是习惯于“听党的话”，诚实地甘愿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和“党的驯服工具”，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955年春天，我本从河内回来休假，但人事处的干部科长通知我不再去越南，把我从国际部调回国内部。先准备要我去三门峡采访大坝的建筑，后又让华山去，叫我回军事组，准备打台湾。夏公然还带着我去了南京军区，听了一些情况介绍，并办好了准备到各军区、部队的通用介绍信和给沿海各邮电局能及时播发电讯的通用证件。结果没打，我回来没事干。那时反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正在“肃反”，对外部的党员只有主任陈龙、副主任肖希明、秘书张贻、记者和编辑袁木与曾建徽。他们都要忙于各自的业务，只好从党员众多的国内部，抽调林耀、余志恒和我前去帮忙，指定我主要搞清原南京天主教会《益世报》总编辑邹震的问题。

从档案上看，邹震的祖籍是东北人，其父原是国民党驻中东国家的一个大使，比较反共。临故去时，还用一只手遥指东北，并嘱其死后将其棺柩指向东北。此时，东北已经被解放。但1948年才28岁的邹震，却暗中同情共产党。他不仅悄悄保护在该报撰写比较隐讳的开明进步的言论的宣谛之，而且对在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多加保护。当国民党发现了这种隐情并要搜捕这些人时，他得知后立即催促这些人迅速转移。全国解放后，宣谛

之也参加了新华社工作，最后在新华社工会离休。

对邹震这样的人，稍有一点理智、良心的人，你怎么“肃”得下手？但“上面”一定要你这样办，我也只好依“示”画葫芦。“上面”叫你参加对他的谈话，我也必定到场无疑；“上面”叫你草写将他“隔离反省”的报告，我也草草写就；“上面”叫你写出将他“逮捕法办”的报告，我也照写不误。隔了些日子，又叫人写将他释放的报告，我更一挥而就。因此，我俩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共同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他曾问我：“你是怎么搞的，也被打成了‘右派’？”我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后来虽然成了好朋友，他还帮我修改过稿件，但每想起那一段，我总感觉对他有一种愧疚之心。我总是想：一个人做人做事，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能凭一时之得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

在搞了对邹震的“肃反”后，我又奉命参加了一位编辑汪永霖的“专案组”。他究竟是《时事手册》还是地方部的，我现在已完全淡忘。那是1956年春天，当时的一二、三四、五六号楼的三大建筑已经完成，“专案组”的几个人就在五号楼的顶层。我们几个人不是把汪永霖叫到这个楼层的一个房间里谈话，就是到他被“隔离反省”的食堂附近的一座楼的房间里谈话。谈话的气氛很严肃，好像他真是什么“混进革命队伍”的应该“肃反”的对象。

其实在年轻时，他只是在国民党很小的一个省西康省省会的一家报纸干过短时间的采编人员。解放后，这西康省因地域狭小，已成了四川省的一个地区了。汪永霖参加革命工作时也早把历史情况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是“组织上”似乎还是要对所有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不管是此时间的真正反动过的人还是短时间地沾了一个边的人，都要非“肃”不可，尽管人家在解放初期的“忠诚老实”运动中早已作过清清楚楚的交代，那也不管用，必须在“肃反”运动中再“肃”一次。这使得汪永霖很为难，使“汪永霖专案组”的几个人也很为难。尽管我们也和他谈过几次话，他本人也隔三差五地向“专案组”写一份“思想汇报”，但这个“专案组”的业绩丝毫无展。

幸好，当年6月份，苏联舰队访华，要在上海外滩抛锚，国内指定我和李耐因同志，

去协助上海分社从事这项报道，并指定我首发访华舰队抵达上海的消息，使我脱身于这个“专案组”，我这才如释重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在内心中，我一直感到对不起汪永霖同志。后来他去了哪里？干何工作？我全然不知，但这种愧对之情，我一直萦记在胸。建国后，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人，有谁数得清？又有多少人吊在“螺丝钉”、“驯服工具”的绳子上做了多少对不起人的事，又有谁说得清？更甭说那许许多多趁机表现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非常坚定”而竭力往上爬的凶手和歹毒之徒了。如果不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那份“秘密报告”使我恍然大悟，那我可能会一直做个忠实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也会成为一个“忠于党”、“忠于领袖”的奴才。同时幸亏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414页，年仅25岁的马克思在给友人信中说的一句话：“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这更提醒了我，坚决不愿意在“兽性”的圈子里打转转。■

【日记节选】

1957年6月22日至7月6日戴煌部分笔记日记

1957年6月22日

三类人物：全部四十名党员，十四名团员

一班乙：九人

| | | | |
|-----|---|---|---|
| 黄碧辉 | 团 | 左 | △ |
|-----|---|---|---|

| | | | |
|-----|---|---|---|
| 刘润生 | 党 | 左 | △ |
|-----|---|---|---|

| | | | |
|----|---|---|---|
| 陈平 | 党 | 左 | △ |
|----|---|---|---|

| | | | |
|----|---|---|--|
| 肖芒 | 党 | 左 | |
|----|---|---|--|

| | | |
|-----|---|-----|
| 周学凡 | 党 | 左 |
| 许淑芬 | 党 | 左 |
| 罗 平 | 党 | 左 |
| 靳钟琳 | 党 | 左 ∟ |
| 陈廉保 | 党 | 左 |

一班甲：九人

| | | |
|-----|---|---|
| 张继志 | 党 | 左 |
| 刘祖禹 | 党 | 左 |
| 吴景生 | 党 | 左 |
| 陶驷驹 | 党 | 左 |
| 孙守明 | 党 | 左 |
| 刘思聪 | 党 | 左 |
| 吴秋亭 | 党 | 左 |
| 袁 伟 | 党 | 左 |
| 钱家镛 | 团 | 左 |

二班：十六人

| | | |
|-----|---|---|
| 谷源桂 | 党 | 左 |
| 龙森林 | 党 | 左 |
| 张泰臣 | 党 | 左 |
| 谢国武 | 党 | 左 |
| 傅积盛 | 党 | 左 |
| 何玉南 | 党 | 左 |

| | | |
|-----|---|-------|
| 李华美 | 党 | 左 ∟ |
| 米 埜 | 党 | 左 |
| 顾静毅 | 团 | 左 |
| 黄 光 | 团 | 左 |
| 杜建宏 | 团 | 左 |
| 李海涛 | 团 | 左 |
| 席道学 | 团 | 左 |
| 周惠芬 | 团 | 左（幼稚） |
| 朱金铨 | 团 | 左 |
| 韩北航 | 团 | 左 |

三班：十一人

| | | |
|-----|---|-----------|
| 刘 民 | 党 | 左 |
| 石 健 | 党 | 左 |
| 庞玉世 | 党 | 左 |
| 戴 煌 | 党 | 左 |
| 孔繁根 | 党 | 左（疲沓） |
| 张春波 | 党 | 左（单纯学术观点） |
| 邢玉佩 | 党 | 左 |
| 郑兰玉 | 党 | 左 |
| 路 虹 | 党 | 左 |
| 王福新 | 团 | 左 |
| 赵积栋 | 团 | 左（政治热情不高） |

四班：九人

| | | |
|-----|---|-------------|
| 胡晓光 | 党 | 左 |
| 原士谦 | 党 | 左 |
| 赵振魁 | 党 | 左 |
| 肖顺秀 | 党 | 左△（水平差） |
| 高德元 | 党 | 左 |
| 王 浩 | 党 | 左 |
| 范 虹 | 党 | （未参加运动，生孩子） |
| 刘 枫 | 团 | 左 |
| 赵莲学 | 团 | 左 |

1957年6月24日 星期一

小组集体汇报：关于章伯钧问题

一班甲：搞清了“人大”等性能之后，说明我国民主是很广泛的，从而说明章伯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认识到其反动性。他不敢在“人大”提，而是钻了整风的空子。大家收益很大。

△弄不清反动分子与反革命分子、右派思想与右派分子的区别。

一班乙：大家认为章提“政治设计院”的目的是要夺取党的领导权。大家也谈到，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的统一问题。在这方面有些争论，最后没有完全解决。有人认为现在在人民内部有绝对自由。

二班：过去对章不了解，对其言论没有警惕，现在才明白其性质。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争论。十六人，太多，要分两个组。

三班：章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另有人说，他就是个人野心家，没有什么主义，结果还没有完全统一。

章的问题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争执不下。共同的看法是：矛盾在发展中，尚未最后定论。

只讨论了上面的问题，对其言论本身批驳得不够，这证明其文件的研读不够。

四班：章的“设计院”的提出，是想否定党的领导，想用资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转为讨论是敌我还是内部矛盾。大家检讨了对其言论认识的过程。

对“设计院”和两院制的区别认识不足。什么叫“两院制”，认不清。

敌我，是因其反党反社会主义，个人野心；

内部，从全国处理方法上来看的。

这些看法没统一，没有争论。都认为现在没法下结论。

黎光：从三、四班的讨论中，说明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讨论不多，不明确。选举、议会、争论等。

敌我、内部问题现在没法下结论，争下去没有什么好处，应集中讨论上个问题。

以后的讨论还是从反驳言论着手。

星期五讨论结束。

星期六支部大会口头小结：情况、收获、问题。

谷：五个人相同的地方可联系起来讨论。

1957年6月25日

集体汇报——（章伯钧、储安平、黄万里）

一班甲：知道储的言论不对，但批驳起来很困难。事实不符，当然好反驳，如科组均安（按）党员和党天下等。党员不称职不怪中央。党力量大，作用大，故民主党派发挥不了作用。

这是错误的，都是为社会主义，为何对立起来？总之，批判得不深不透。

为什么副主席和副总理中没有民主党派？大家弄不清。只想到一点，过去是一致对外、对蒋，大家是团结的；朝战后，主要是改革，这些人士可能不宜于再留在政府里了。

对黄万里的批评很容易。

一班乙：储、黄是从不同角度反对党的领导。从人事、建设的事实反驳了他们。

有一个人认为现在还是联合政府。但大家不同意，认为是工人阶级专政。争论了很久，最后认为联合政府就是平分秋色，共同领导了，而现在不是。

一班甲：我们认为现在还是联合政府。

一班乙：阶级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说法是否矛盾？最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成，阶级正在消灭中。

自从宪法公布后，四个阶级联合专政就结束了。

这些党派作用又不大，为何要长期共存？

二班：对储的批判如上。

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就是干不了。如叫章乃器去领导经济改革那就完了——不劳而获也不是剥削。

有人认为，他们到人大去，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有人认为：拉一、两个人去做副总理也可以。

大家认为黄万里比葛佩琦还恶毒。他连什么人都骂了，连他老子也骂了，就是美国好。

三班：大家抓住了储的党天下问题。附带批判了章、黄。比昨天收效大。有些问题扯远了。

陈玉兴认为现在与民主党派合作只是利用，这个问题没争论。因为不仅是利用。

谈到宗派主义扯到干部政策，认为过去重德不重才是对的，现在不行了。其实我党过去也是重视德才兼备的。这问题也没争。

明天也要有个准备时间。

最好开一次党小组会，检查发言问题和学习态度。

郑兰玉问：十二个副总理中有一两个民主党派人士有什么坏处？

四班：讨论中没有分歧。

党天下是宗派主义根源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许多事实说明，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党员负责。第二、党从未这样想过；第三、民主人士在从上到下的政府机构中都有地位。

储说现在不是联合政府了，是党不好。其实，宪法第一条就说明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都举手通过的，你们也承认了建设社会主义纲领。那么，就要肯定，谁领导最有力？同时，还又安排了你们。

问题是这样明显，你们还要这样提，那不是争夺领导权是什么？

大家对政协、人民大会的作用和性质了解不够。

认识到黄万里抓住一点缺点，扩大化，来否定我们，挑拨人民内部关系。

黎光：今天比较地抓住了中心。

三班孔等说储等是官迷。不是，他们要推翻我们。

黄万里否定我们，大家知道。关于歌颂问题可以讨论。

支委组长最好事先研究一下，讨论中掌握什么问题。

半天读文件，半天讨论。

联合政府等问题可以联合争辩。

6月26日

集体汇报（关于章乃器）

三班：章乃器以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强调了资产阶级的光明面。第二、掀动资本家反抗工人阶级的领导。

一班乙：目的是为资产阶级辩护，拒绝继续改造。

大家认为交出生产资料只是改造的开始。定息是剥削。

有人提出：有些资本家要放弃定息，政府为何不让？

放弃定息，也不等于改变成分，就像土改后，地主还要经过一定时间劳动，自食其力后，才能变成份。

四班：有人问：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是否一样危险？甚至官僚主义的威胁更甚？

官僚主义是否有阶级性？各个阶级社会的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是否不同？最后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消沫（原文如此）官僚主义。

一致认为章乃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着修正主义（反教条）的旗子，反对马列主义。

二班：意见同上，没有争论。

银行利息和公债利息，是否不劳而获？

定息仍然是剩余价值。

“学习”杂志说定息是国家预算中的由银行支出的。大家认为这模糊了剥削的实质，因为这仍然是从企业利润中支出的。

把“特殊材料”的含义歪曲了。把共产党员和李万铭混为一谈了。

铁托说，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产物，那是从斯大林事件的角度说的。

一班甲：按小标题逐点批判的。

脱胎换骨是指思想意识的改变。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故意捣蛋。

“特殊材料”是指共产党员的崇高的气质，根本不是本人就是一生下来就特殊。他是故意的。材料本身是先天的，谁也没有这样迷信地说过。

官僚主义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现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只是一个缺点。以一个缺点和一个人吃人的制度相比就是荒谬的。过去资本家们饱食终日、不问生产、不懂生产的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得多哩！

不能说合营了，意识也就改变了。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革命与反动，而不是先进和落后那样地没有阶级界限。这是根

本水火不相容的，而不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只是先进与落后而已。

不劳而获不是剥削，劳而获是剥削吗？

章的全篇发言企图把工、资混为一家，取消了阶级界限，强调公私不分、党与非党不分，是想取消党的领导。

6月27日

集体汇报（关于罗隆基、黄绍竑）

一班甲：大家从切身经历中说明肃反是非常慎重的，成绩是主要的。

罗、黄是为反革命分子撑腰，否定成绩，要反革命家属申冤，这一来就不得了。

平反委员会是超越范围的权力机构，企图脱离党的领导。

二班：罗一边说要党参加，后面又说要原肃反者要走开，这样就使得党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这是为反革命撑腰，必然助长反革命猖狂活动。

黄是豆腐里找骨头，替反革命分子申冤。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基层对政策掌握不够。

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人都是民主人士，他们与反革命分子家属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更使他们火上加油。

要党保证不打击报复，好像党过去是没有保证似的。

希望政府对流氓盗窃犯要严办。

否认成绩、夸大缺点是错误的，但多谈谈困难是必要的，

三班：对罗的动机和“平委”的效果均分析了，好像他比共产党更为人民服务。他的说法是违法的，既然有政府、法院、检察院，有什么事做不了？有什么冤不可伸？有什么报复者可逍遥法外？

伸冤的界限是什么？如果这一来，原是反者也可能起来伸冤。

说党发展太快，主要是“侵犯”了他的阵地。

黄说不要党向人民发号施令，大概只有像他们之类的人民不高兴，其他人民是愿意听的。

肃反成绩是主要的。

当然有个别地区的个别事件明明做坏了，也说成绩是主要的，如去年发展党。

肃反中，有些做法的确是违法的。

一班乙：政府也是党领导的。联合指示只有号召力更大，而不会有害处。

大家不想说正面的话，找问题也未找得出。

四班：没有争论，没有问题。

对罗的认识，首先肯定肃反的必要与成绩，从而说明罗是不对的。他不仅不要党领导，并敲锣打鼓地要人民向党进攻。这不仅把一些坏分子、心怀不满分子挑动起来，就连向李玮（原文如此）这样的中间人士也都被挑起来了。天下大乱，只有对他们有利。

二班补充：韩北航说联合指示是党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受到了批判。联合指示的均是群众性的活动；在人民方面，也从未把党、政分开。他自己也检讨了。

6月28日

汇报“收获”与“问题”

一班甲：收获很大，比在机关还好。因为这里是前线，有右派分子。

开始观点模糊，没有看出问题，或看到不对头，也没从政治上着眼，只认为老和尚、小和尚是不礼貌。

只有斗争才能锻炼人。

又提出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的界限问题。

三大改造胜利后，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减弱了。

开始怀疑反击是否过早，后才明白。

通过这次学习，说明过去单搞英文，无形放松政治，以致这次嗅觉不灵，即使灵了也反驳不了。这是危险的。

反孟时，说别人扣帽子，自己又不写。

一班乙：开始忙于考试，对反动言论不大关心，有些看来不对头，但不明其目的。看到有些话不好，还说“说由你，信在我”。

这次事件证明，我们国内思想情况很混乱，盲目乐观，说什么资产阶级比兄弟国家的党员还进步。

开始没有嗅出这是右派的进攻，阶级斗争观念差，自由主义，看看大字报而已。

收获：认识了右派分子的阴谋，克服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和麻痹大意，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始划清了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界限。以后对一切言论应以阶级眼光批判。从这次斗争中可看出，党对每一个党员的要求都很高，大家要赶上来，支部今后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现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对鸣放的政策有了明确。

问题：内部矛盾和敌我问题；

今天是否联合政府问题。

一班甲：认为是工人阶级专政，但形式上还是联合政府，只是口头上不这样说而已。

一班乙：有人说共和国成立就不是联合政府；有人说宪法颁布后才不是。

四班：过程：由辨别不清到认识明确。

开始只对葛的骂党有明确的反感，但对其他人的都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击后开始明确，这周的学习就更明确了。

收获：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明确了，如过去有人问：内部矛盾怎么还有阶级斗争？现在明白了。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合营之后，对此认识模糊。几年来，对阶级斗争警惕不足，这次敲了警钟。所以在开始时，大家对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今天，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出现，十分惊奇。现在划清了与右派分子的界

限。

过去，对统购统销等政策的忽高忽低有意见，现在认识清楚了，总理的报告很清楚。

对联合指示，也是有意见的。现在知道，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有工作更好做。

问题：反右派斗争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总理报告中说得清楚了，但是思想不通，因为这些人已经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背景，有活动，已构成反革命了，为何还当人民内部问题？

二班：收获：划清了思想界限，提高了觉悟。

过去对“设计院”、农民苦，联合指示等问题认识不清，甚至包括定息20年在内。

有些问题不好批判，谈得不深，发言只三言五语就完了。说明水平不高。过去忽视政治学习。

学习布置不具体。

问题：联合政府问题，矛盾性质问题，搞清历史不是成绩——因为肃反是肃清反革命。

希望在下学期学习一下毛主席报告，

三班：过程：有些东西一看就知道了，如不劳而获不是剥削，肃反没成绩，杀共产党等；但对“设计院”、“党天下”等模糊，并有人共鸣。

有人开始急于要反击，反击时又说过快了。现在明白中央是正确的。

认识模糊的原因是政治麻痹，觉悟不高，右倾情绪。

同志们所以这样，是处于整风中，只准备听缺点的，所以也没注意这是右派进攻；有些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相似。

主观上是右倾、麻痹。

收获：明确了立场，划清了界限，明白统一战线还有许多斗争，提高了警觉和觉悟。

问题：党群关系是否比解放时有距离了？一说是，一说不是；第二是农民生活苦不苦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提高了，但工农、干群悬殊太大。有人说工人生产率高，按劳取酬；但别人说，国家对工业投资多。第三、个人崇拜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张春波提出的。

第四，为什么副总理中没有民主人士？

6月29日

讨论十个问题

一班甲：①一致认为反右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因为还没有破坏的活动，右思与右子的界限没法划。

②本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形式上还是具有联合政府的味道，但不提。对他们不是利用，副总理中为何不要民主人士是中央决定的，一定正确。

③没有这个意见。

④农民问题，总理已报告了。

⑤党群关系不及过去好，严格要求自己。

⑥搞清问题，还算成绩。

⑦强调“德”是对的，而强调“资”才可能产生宗派主义。

⑧自由与纪律、集中与民主问题没谈。

⑨政府不让放弃定息，因为资本家不是甘愿的，同时要照顾到国际影响。银行、公债利息不是剥削，也不算“不劳而获”，这是国家鼓励人民的，对他们的行动的报酬。

⑩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比。

一班乙：

①有个别人认为这已超出内部矛盾范围，因为这暴露出其只有反动的一面了。

②不是联合政府。

③没讨论，崇拜问题。

④农民苦没讨论。

⑤个别的不肯下乡下厂，与工农不像过去那样密切。现在已改进了。

⑥有斗有查，搞清问题是成绩。

⑦“德”问题没讨论，不同意这个说法。

⑧自由、纪律问题没讨论。

⑨银行、公债利息不是不劳而获。剥削与不劳而获是否有区别？没统一。

⑩官僚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消灭它。阶级社会是提倡它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容忍它的。

四班：

①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没统一。

这是内部问题，但是对分子的划分有了争论。认为右思、右子是有区别的。右子是有企图的，有纲领的；右思只是糊涂，但不推翻社会主义。

认为章伯钧已构成反革命分子，因不仅反党，并且有组织、活动；他和我们已是敌我问题，但我们以内部的方法来处理。如果不是反革命，他与胡风有何不同？（这个看法有四人）另四个人说，现在说他是反革命过早，同时对反右派斗争不利。他们过去反过党，但也追随过共产党，解放后参政，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但有其阶级基础，必然反应其阶级利益，不是奇怪的。虽然反社会主义，但仍是内部问题。

先认为是敌我，但方法不同，这是聚而歼之，看法是错误的。

⑥材料不足，采取斗争形式，以后又无问题，是错了；历史的问题也可审干搞清，不该当反革命分子斗，斗到最后无问题，搞清了，也是道歉的，这就说明也错了。

7月1日

党委布置这个礼拜的工作

今天9时半，声讨孟思训；

7月2日8时半，声讨沈以光；如今天个别谈话谈得好，明天就先开班会，其他班可派人参加。

上周六下午支书会，中央精神是要将右派分子打得狠，打得准，到投降为止。另外，对各班的右派思想要弄清楚。例如现在还有人说章等五人不是反党，而是一时糊涂，争得很厉害。沈以光说政协人才多，可以做设计院，向人大建议。报纸以后不要再喊千岁、万岁。20次代表大会后，他就独立思考了。而不是党化了。

过去对反沈，许多人已准备了，拿出来看看，组织专题上论坛、写大字报等等。

对沈以光的分寸应注意。对孟，大会后，要通过决议，呼口号；对沈就可以不呼口号，不通过决议，改为是问题要他答复。

决定一律不上课。

同情他的人可以上去讲话，例如说他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右派思想。

对他和对孟在精神上、态度上要有区别；但在说理上要一样尖锐、深刻。

下午2时半，党委扩大会，李恩求主持。

总理找学校负责人开了会（在中南海）。

孟、沈猖狂，各支部还有问题未解决，故不能草率收兵。对孟、沈典型人物，思想上一定要其投降；第二、一切右派思想问题均要搜索出来解决；第三、考试不搞了，一律改为考查，代训班补课，延长放假日；第四、联合搞，如五个教研室联合起来。时间是这一周的。

市委通知（中央指示），坚决追查和歼灭右派分子，直到他跪下投降，使其今后再也无法向社会主义进攻。

△“七一”大示威停止了，校际联合作战也不搞，不要分子下厂下乡，工人农民自动找他谈，也不禁止，如葛的处境。

以后打右派，要有具体对象，具体内容。空喊就不好了。

要求中央首长谈话，现在人大很忙。

对左派分子的恐吓信很多，北医党委也接到。炸弹是先头部队，上街头搬家。陈桓也收到信，三朝元老，五千元路费，以离间我们对他的信任。

△六种右派分子的规格：省市性的、全国性的、校级的、年级的（副教授以上的要市委批）、班级的、组级的。

民主党派内部揭发。

△加强公安、保卫工作，近来各地、尤其是公共场所，出现不少“打倒毛泽东，欢迎蒋介石”、“共奸党”等反动标语。开会时有人投热水瓶，篡改大字报，南京“行动小组”支持葛佩琦。

△毕业生中，应把右派分子分五类：判刑、劳动教养、留校考查（以上是强制的），对一般右派思想和个别问题右派思想的只是一般考查，可分配的也要把材料送给机关。

对孟的火是他自己点的。上周六英教室全体怒不可遏，号召战斗，大家响应的。今天上午大会基本上是好的。他已表示低头，假定以后不出来，组织登门战斗，三三五五，但不准像今天大会上那样骂。处理全国一致，不要乱要求，否则被动。党不满群众要求就不好了。看看今天的社论。要安排教研室座谈，必要时组织支援。

△孟可能有现行背景，组织调查小组，秘密进行。

下午，孟发言乱，假，可轰下来，继续攻击。如果有点检讨的内容，我们也要保持士气，说完之后，抓住发言中的小辫子，立即上台攻。来不及动员，支书要上前线。他交出有关人时，我们不要转变方向。

△注意会外活动，如登门拜访问题。

对沈的斗争规模可考虑。另外还有十个多人，已暴露了，各支部解决。战斗中注意与党委分口联系。

7月2日

下午7时半支委会讨论：

- ① 加强保卫工作，提高警惕，一见可疑现象立即报告；
- ② 搜索右派分子、思想，准备解决：

A. 三班的陈玉兴，赫鲁晓夫该枪毙，廖、谭的农民生活报告是假的等。

决定：首先在乱说话这一点上要批判，其次解决这几个思想问题。

B. 二班：通过斗争活动的讨论，检查学习，斗争态度，解决韩北航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态度问题；

C. 全支部的情绪均疲塌，斗争不积极，不肯看大字报，不听指挥——不上台讲话，不肯做记录，不肯开会，开了会急于要休息，甚至要求缩短会时早散会，这一切说明对党的利益不如对个人利益关心，一提打球、看电影、看花、上馆子，情绪是那样的高。我怀疑，特务向我们进攻时，这些同志是否敢于抵抗。

③ 战斗活动问题：

A. 分析沈的问题，对他的看法；

B. 各组检查战斗积极性，消除自私自利的政治疲塌现象，要检讨；

C. 解散报纸编辑部，各组负责，看情况，搜材料，要这么写就怎么写；

D. 日常听听对沈的批判会，看看大字报和整风快报稿件，保持一种积极战斗的精神，党委已有新的指示，好行动；

E. 团分开，按支部精神独立活动。

支委会领导问题；老油条问题不是事实。

大字报问题；

检查不积极的原因，领导是不抓紧的，没有把所有党、团员发动起来。

听从指挥问题，还是可以布置的。

对张春波回去的问题，没经过支委会讨论，他的情绪是不积极的。

忙闲不均，没有把团的作用发挥出来。

对沈以光的看法有分歧，党委、支部布置有关系。

落后已有两次了。声讨炸弹没表态，对孟的声讨也未及早布置。

许淑芬也未参加斗争，原因要解释。

对支部的疲塌现象没分析出原因，从主观上说，支委会有责任，一般地指出与号召不解决问题。对赫中的问题支委也要检查。

支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整顿思想要提出具体的来。

首先从戴煌同志检讨起，声讨手榴弹大会半途归来，对赫中管教不严，对沈以光的看法太右——以理服人当时就是泼冷水。要找沈座谈还要泡茶、买糖果——这与整个气氛不符。也不让我去听（人少的原因）。说三、三火力旺，反而表扬了本支部新闻自由写的好——这非常刺耳。要找你谈沈以光的问题，你不谈，谈自己受处分情绪不高，其实沈没受过处分。

7月3日

党委对陈玉兴问题的讨论

- ① 赵毅给党委的一封信；
- ② 20 大后，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认为是败家子，波匈事件后，说赫败了斯大林建立的家业，伏来，他说赫来就不去欢迎，该枪毙。
- ③ 农民问题。廖与艾相同并论。
- ④ 整风中的情绪。
- ⑤ 原薪与助学金问题。
- ⑥ 革命后，工农干部没文化，吃不开，只有知识分子吃香了。去年人家拥护高知，也大骂。
- ⑦ 对赵敏的态度很恶劣。

7月3日

晚八时：党委研究对陈玉兴的批判会：

1. 强调说理；2. 不要紧张。

7.4 晚支委会

A、关于陈玉兴问题：支部大会搞，先叫陈本人检查，检查得好，别人补充补充，就可以结束；搞不好，下午大家再分析帮助。大约一天也够了。搞的问题范围不限于农民问题，高饶问题等一齐谈。

B、个人问题；

C、关于张春波问题，当天大家酝酿，他准备。星期六上午支部大会检查。

这时，如陈还有问题，请其继续准备，备以后找机会再搞一次。

要求，对上述两个人类似的思想问题一定要彻底搞透。

D、关于支部领导问题，待上述两个问题解决后，

支委会公开检查，请大家再提意见。

个人问题也应主动检查。最好放在张春波之前搞。

7.6 上午 9 时党委扩大会

李恩求：传达邓小平在前天召开在京及参加人大中央委员及京军政党组负责人做了报告。昨天市委组织部开会处理党内右派分子问题，团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有地方还未搞起来，如文化艺术系统。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反右派斗争还怀疑是否值得搞，更多的党员表现不积极，也就是怀疑是否值得搞。中央认为运动意义很大，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超过以往任何思想改造运动。匈事件的原因就是基础与思想意识形态的矛盾，上层分子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从裴多菲俱乐部开起的。我们只有灭资兴无的思想改造运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内的三害从 1954 年起不是减退，而是滋长了，特别是 1956 年评级，更突出，有人就是为了几块钱，而怀疑党的政策。党外也讲，三大主义也发展了，这纯粹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到党内外各方面、各角落。“时事手册”支部七个党员，一个学习，另六个全部

起义了，团员也是，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了。资产阶级右子有市场，去年学生中多，他们要解散党，打垮党。这要大讲特讲，反复讲，动员大家继续战斗，同时，锻炼自己。毛主席说，运动已开始深入，有点味道，这时就有人要收兵了，有松懈情绪。还是要放长一些好。解决思想阵地的所有制问题——无产阶级所有或资产阶级所有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教条，是无的放矢；现在，有活生生的靶子摆在面前，正是好运用马列主义的时候。两章，章伯钧常检讨，章乃器不出来，对我们有利，马列主义还可用，谭天荣、林希翎是运动中最可爱的人，我们的马列主义用上了，否则就要收起来。

五百万知识分子有用，但问题重。他们通过文艺新闻出版整天向人民灌溉自己的不正确的东西。战斗性弱，特别是文学艺术、新闻界的文化人，自由主义严重，所以战斗不力，另外一些人是温情主义，怕伤感情，认为慢慢来。

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不问政治，思想退化，麻木不仁。有很多党员即使投入战斗，是不自觉的，认识组织上指示，不得不做。中央组织部也不出大字报，那是确实没有什么好放的；但是交通部，章伯钧是部长，人们也不出大字报。有些单位一个右子未搞出，很后悔；有的搞出来了，斗争不力。

党内的右派一视同仁，再不要给人家骂宗派主义，也要见报。真正危害的是党内右派。北大反党的是一党二团，他们也带头了。有些老党员完全蜕化了，我们再叫他共产党员就是歪曲了他的思想现状。匈反乱，也是党员带头的。平时心怀不满，评级不满等等，就是要拉出来。前清华党委书记已除出党，就是右派思想言论；青年报副总编辑和出版社的一个党员将要在报上点名。

号召全体参加大是大非的斗争。有些领导干部有小辫子——搞女人，分福利金，就是不敢出来领导大搞，应该出来公开检讨，就剃掉小辫子了。

杨芳：中组部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问题，有些党员不积极，同情右派，有的本人就是右派思想。有的跟人家跑了，有的跑了一会又回来了。有的对运动兴趣不大，对党内的右派思想温情主义，估计不足，没有深究。最好是从整风开始出现的右派言论（提意见反三害

的不算)都要见账。正在草拟处理计划。

立即要处理的是:

- 1、阻碍运动开展的;
- 2、大家已不承认的党员;

对党内的右派思想要深究。

对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右的,要准备个材料。向党进攻的、不肯参加会的、有右派思想的等等。

有人很幼稚,说林希翎13岁(?) , 23岁(?) , 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现在查明28岁出来的。¹支持林希翎的要开除党籍、团籍,但是支持的程度怎么样,要看具体情况。申请退党者立即批准。

于厚华:团内要立即处理的:

- 1、右派分子有四种:

- A、与右派组织有关系的,如林、谭,立即开除;
- B、有政治企图的;
- C、比较严重的,思想反动,掀动被肃反的人起来向党进攻,开除;
- D、与党有距离,跟着右子大喊大叫,但本人没有什么系统的反动言论的,这是一般的。

处理以后再说。

- 2、叛变分子:卖党求荣,以党内秘密进攻党的政策,开除。

逃兵、消极、回家的,开除。

- 3、严重错误的,成立反动集团的,开除;以个人成见出大字报的,要处理。

处理:右子和叛变分子开除;严重错误的开除;一般的还要考虑。

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团员占60%,现在留下40%就可以了。过去错了,现在假积极的,还是开除;即使痛哭流涕者也如此。阻碍运动的支部领导,停止工作。

¹ 此处原文不清(下同)——编者

同意林的观点者开除，不是对个别事实的同意。参加组织认为不自由者可以让他走，自由。

李：对邓的补充：一定全体参加大是大非的争辩。高级党校是全国七分之一的高干，要回家放假，说没有右派。中央决定，借社会上的右派来搞，不准回家。看来党团员不要再想放假的事了。

本院情况：有些支部领导不力，如许子丰。另戴煌，对支部内右派思想反映不足，本人还同情。有人开会还打毛线等等，有人疲塌。这不能说党不打招呼。不仅思想上划清界限，组织上也要划分界限。

注意，不要误认为这是大清党、清团。不要下传就不会引起这些恐惧。有不同意见可以从党内向上声明保留意见，这个绝对允许。但对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下午，开一小时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以后过组织生活，检查右派思想、右倾情绪。下个礼拜是战斗检查，（批判），处理相结合。但对已列为批判对象者继续进行。

重划左、中、右三类分子。

有人对妻子儿女的事看得重，但对大是大非的运动却无所谓，这是什么呢？组织上叫做的事必须做，请假一定要经批准。

（涂灰的是用笔划掉的）

神话和特权，

？国民党政权，

农村干部一团糟，？？出？化分子的天下，

苏联干涉匈内政，美帮蒋也是武力干涉？？

密室小声？杀，可恶，

除道德品质外，不如资本主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愚民政策，

？不如美帝深入战场的程度，

党忘记传统，专讲自己享受，

王明问题，

党内也有？？

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和台湾不如可合并了，

斯大林派，

△时事手册“起义”，

个人崇拜，人民力量没有了，都是毛主席的。

社改太早太快，学校反右过猛，要批评。

搞错了要道歉，放走赫中，和张要开茶话会，

和孔（繁根）谈话，悔悟不谈新闻难，¹

回家后问大字报问题，

毛主席不虚心，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评邓子恢，

毛、中央抓建设，忘教育，要检查，

出现了北京特？团，

选举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投票，

右派分子也收到恐吓信，

对斯大林分子和风细雨是不行的，

佩服传教士，

匈事件后苦闷，

不用批评？，？？到处叫屈。

有良心的不能平静，说来痛心，

多领两个月国外工资六百元（？）

¹ 后被此人揭发。详见1957年7月20日《前进》。（编者注）

在上海不到十天就用了五百元（？）

在肃反中迟到早退，

生活水平超过大家，

用内参材料攻击党，

招摇撞骗的活动，

（一张纸上写：）

在不满和埋怨的情绪中产生而弄假成真

对北京的观察，就像三年前他在朝鲜呆两年之前踏上安东的土地一样。

问题：

- 1、 为什么对党、对领袖仇恨？
- 2、 为什么苏联援匈驻旅大有意见？
- 3、 对储（安平）、葛（佩琪）、章（伯钧）为什么同情？

【工作笔记】

戴煌 1957 年秋冬至 1958 年冬春日记摘录

1957 年 10 月 6 日晨于 1 号楼 34 号（厨房）

隔壁住着一位保卫科的青年，自以为是党的最忠实的保卫者，神气得很。他的年纪并不大，个子也不高，但是他觉得走路应当挺胸脯，昂起头——甚至是歪着头，走路应当高脚阔步，用钉着铁块儿的皮鞋后跟猛烈地击着地面，头动尾巴摇，因此每逢他回来还出去，楼梯和地板无不了都要遭受到风暴般的袭击，摇摇晃晃，吱吱响。他的眼睛很好，但他似乎必须戴副眼镜才更合适。他每次外出都要锁门，就是到对门的洗脸间或厕所去小便，都要锁门。显得自己很神秘，神圣不可侵犯。可我要每天被他的数十次开锁的锵锵声所扰乱。

1957 年 10 月 8 日下午 4 时半于京

午饭后，到后门口去取鞋，顺便把一把生了锈的带剪子的小刀请磨刀匠磨一下，他说要两角钱，因为这是细活，难做，而菜刀只要一角钱。他叫我二十分钟后来取。我想既然跑来跑去，不如就边等着，拉一拉也好。

这是位二十多岁的削瘦的青年，戴顶鸭舌帽，穿身破烂的黑衣服，右肩尤破，大概是他经常扛着这条笨重的带着钢刀、磨石和水箱的大板凳磨的。他的腰间围着一条布裙，上面有很多小洞，原来可能是白的，现在由于经常擦锈，已变成土黄色的了，就像在水中沤了多少年生满了水锈的一样。

他是天津南门人，一家子均做此活。他已做了三年这样的活了，两三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住处是天桥，国营的一个旅店，自己的被窝，很多人挤在一张大木炕上，每人每天只出二角五。

同住的尽些磨刀的、理发的、收破烂的，总之一句，尽些些全部家当均在一条长凳上或一付担子上的人。

他每天一早就出来，晚上如有活，还要在路灯光下干到晚九点或深夜。新华社是他的老主顾。他说：厨房肉案子上的刀每隔一星期就要磨一次，不来怎行呢？

他每天能磨刀 80 把，当然到了晚间，两臂就酸痛得好像长在别人的肩上一样。实际上，每天只能有三、五十把活，平均每日得五六元。可是他每天至少得吃去一元五，像烟盒一样大的馒头，每顿得吃 20 个，吃炒面每顿要二斤。每天一盒烟，是大象或大婴孩的，就和我抽的一样。终年不看一场影戏。每月要向天津家中汇款三、五十元。

我问他，他扛着这家伙上下车，人家叫上吗？他说电车、汽车均可上，自己自爱，放在一边不碍事就行了。

他有两块石头，一块大些、粗些，每斤值七分钱，一年要用两块；小一些的是细磨石，论块买，每块一元多，一年也要用两块。刀一般的先在粗石上磨，磨快了，但不好看，很

粗糙，所以要把小石块放到大石块上，再加一番功夫，把刀口磨得又细又光滑。石头是固定在这一头的，旁边也有一个固定的扎在凳腿上的敞口的锈铁盒，里面是半下浑浊的水，小石头是放在另一头下面的长方形的小篮里，里面有一把钢铲及几把另刀，这些都是最好的钢做成的，可以铲削菜刀口，每把约值五角。另有一串菜刀柄，如果磨刀主需要换个刀柄，倒也方便。最后就是那个小铜喇叭了，平常他通过大街小胡同寻找主顾时，就是吹着这玩艺，鼓啦鼓啦地响：打打地打，打打地打！

我想，他终年磨刀，不知有多少把，最后又总是把刀口磨的这样亮，这样快，难道就出不出险事吗？譬如说，一不小心，划破了手？他立即把手伸给我看：大小口子多得很，像双劳动妇女在冬天生满裂纹的手——也很像我的母亲的那双手。每月总有若干次割破手。他没有药，只能把那又脏又破的围裙撕下一角来包包扎扎。接着，他又把帽子取下，在光头上有着很多血疤伤痕。原来是替人家磨剃头刀时，磨好后为了试试快不快——不快他是不给主人的——总是自己在头上试一试，动不动就切破了一块。

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者，也具有如此的品质。

拿鞋时，我发现右鞋的右帮小了，原来鞋匠不小心，钉掌时顺便也在帮上钉了三个钉。他给我拆去重钉，但是在我这双鞋上却留下了六个小洞。一双鞋 3 元 4 角，只穿了一水，我满心想再多花了 8 角钱之后，使它能够为我多服务几天的，谁知反而缩短了它的寿命，我好不懊悔。想向他说两句，但又没开口，他一个月大概也只能挣百元左右，家庭负担可能很重，算了吧。虽然在我来说，一双鞋的代价也是个比较重的重担，3 元 4，加 8 角，足足抵得上我一个礼拜的生活费呢。

他连连说：这没关系，这没关系。我笑笑，就拿着鞋回家了。

我的心上有一条河，

淌在河中的是泪流。

多穿一件怕你热，

少穿一件怕你冷。

教子教孙须教义，
栽桑栽麻胜栽花。（抄报）
身屈志不低，傲骨根根全；
昂首天下走，功成再相见。

57年11月5日下午

参加对资料组“右派‘专家’”反党小集团的批判会有感。

他们是一层黄沙，大风一吹，刮得满天蒙雾层层。胆小无志的人怕沙子钻到眼里，闭着眼，大声嚷嚷，啊呀，真厉害啊，真了不起呀，真有一手啊；镇定志坚的人，却偏要睁大眼或眯虚着眼看到究竟，结果很清楚，这不过是些灰沙，只是借着一阵风才这样满天飞舞。待风息地静的时候，天空晴朗且净，沙尘不知落向何处了。

58年1月31日 星期五

下午到抄手胡同北大边的近代理发馆理发。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个青年。从他和理发匠们以及坐在我右边柜台里的掌柜的谈笑的表情看来，他们很熟了，而且他是东郊的一个什么工厂里的。他们谈到了买公债。掌柜的——一件单衬衣，外面只套了件白（实际上是灰白的了）工作服的，胖胖的中年人，留着小胡子——说：他前天坐三轮到车站去，一想到买公债的事儿就心神不安起来。因为街道居民委员们动员时说过：常坐三轮的人，少坐几次就可以买足公债了。他正这样想着，三轮车夫突然也谈起这件事来。车夫说，人们动员他：只要多踏几次三轮就够买公债的了。这位掌柜的不禁失声笑出。车夫问何故。他只好打岔差地说：刚才见右手那个小胡同里出了件可笑的事。车夫问何事？他茫然了，只好说：是件模模糊糊的事。

“这真是人民内部矛盾啊！一个叫少坐三轮，才能完成任务；另一个就叫多踏三轮，才能完成任务；唉！”掌柜的说。

理发匠搭腔了：“我买了三元。他们说，每天早上少吃一个元宵或中午少吃一个红果，一个月就可省下一元买公债。人人均如此勤俭持家，不知要买多少公债呢！可是对做买卖的人又说：要改善经营，招揽顾客，多买债，多赚钱，每天多卖几个元宵、多卖几个红果，每月就可多买一元公债。这不也是矛盾吗？一个要大家勤俭持家，最好什么东西也不买；另一个又要做买卖的显出本领，反对勤俭持家！”

那个工人则说：现在节约也节过头子了。过去一年发件工作服，后来说节约，改为一年半发一件；现在又要节约，只发大哈啦（就像孩子们的围嘴一样，只有前面的一面布，背后没有，而只用两根带子扎起来。）理由是，工作时只有前面会脏衣服，后面碰不上。这倒是符合事实，不过，大家都变成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了，每人一个围嘴子，像什么话？不仅如此，昨天又有人提议：就是这样的围嘴子也不能一年半发一件，而是坏多大补多大，一直等用得粉碎为止，但至少得用一年半。我看这简直不像话。节约只能生产中节约，生活福利上不应该这样尅扣人！”

我听了他们的话，很不以为然。这些人可以说是落后分子。

58年2月3日 星期一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虽然他们的人数并不太多。当你只是横穿过沙漠，足上沾染了一层灰沙，来到一条河流旁边的时候，他们硬拉着你下水，说你需要洗个澡。可是他们又不让你自个儿洗，而是擒住你的胳膊，向深水中按去。把你淹得半死，然而他们却要你说：这是他们的功劳，否则就淹死了。当你回到岸上，在自由的空气和阳光下昂首前进时，他们又会说：如果不是他们帮你洗个澡，你是不会有这种清新的精神的。

是的，就是这样的：他们险乎没把你打死，可是你还得要谢谢他们；一旦你立了大功，他们会说其中有他们的一份。

58年2月12日

我生于 1928 年 2 月 12 日，今天是 1958 年 2 月 12 日。就是说，我已经年过半花甲了。

在旧社会里，略有身份的人每当此日，都会有很多亲友前来祝贺，除糕粽、寿面之外，还有对联和中书，大吹大奏，大吃大喝。至少，自家人也要吃个寿面，炒几个菜，喝两杯小酒。穷人家虽然没有这一套排场，但是只要想到办法，即使是白菜清汤面一碗，也要表示自庆一下。

而今天的我，由于被扣上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所谓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气氛下，当然没有任何人来关心我，祝贺我。我曾经向小孩的外婆说过。她也曾说了一句：那下点面吃吃吧！我表示算了，她也就再没坚持。其实也无所谓坚持，因为她对谁也没有真正的（即使是表面的）爱和关怀。作为一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的生日都不记得，更不用说对我这个女婿有何同情了。她所以说那句话，只不过是面子话罢了。

只有我的母亲，才是真正的母亲。全家三十多个人，从儿子到媳妇，从孙子到孙女，每个人的生日和出生时辰，她都记得一清二楚，虽然已是年近七旬的白发老人了。但是她也不会在今天想起来对我来番祝贺（因为没有钱，大半是怀念和祷告，流几行悲酸的老泪），因为三十年前的今天，是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家里人所牢记的也只是这一天。

没有办法，还是自己庆祝自己吧。中午在国会街 26 号新华社南方食堂吃饭，特地花一角钱买了个肉丁烩南方豆腐，加七分钱的一大碗白米饭。

晚上回到皇亭子新华社宿舍的一号楼一号的所谓的家，与小孩的外婆吃的是稀饭，还有几片馒头和咸菜。

夜里，当然只能读书。

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58 年 3 月 9 日 星期日

太阳甩西了，屋里亮光光的。我洗好了衣服，到屋外去晾在绳上。隔壁窗户里传出酒杯当当的碰击声。在那里是经常有这种声音传出来的。有一个人，声音沙哑，活像只公鸭。

听出来那是满脸络腮胡子的林麟。他劝人们干杯，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你们是同乡，应该再干三杯，赶快喝光瓶里酒好吃饭！”吃喝为何如此积极，把这积极精神用在工作上是多么地好，

这种人对别人不会有多少的诚恳和真正的友谊。有酒有肉就是友，好话多得不得了。如果对方一“犯”了错误，受到打击，他就会翻眼不认你是老几。很显然，严肃的批判和诚恳的挽救与这种翻眼不认人的态度本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

3月8日晚，我从十三陵水库工地回来。扛着行李走进门，见一个穿花衣服的姑娘在整理床铺，原以为是晓旅的妹妹继民来了，后来才知道是刚刚到来的保姆。

据旅说，因为她母亲手疼，不得不雇个人。一天一元工资。可是我心里并不以为然。我想：我的处理快了，不会超过3月份。以后到何处去？不得而知。我很想积蓄一些钱，哪怕三元、五元也好，总比囊空如洗的强。她和她的母亲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呢？一个月三十元，在过去来说，只不过占我个人工资的1/5还不到；可是对于我的未来，这将是我想也不敢想的数目。这又是地主阶级本质的一次表现。本来我每月给“岳母”一些“临用钱”，后来她不好意思要了。现在见我一连两个月没给她钱，也许心怀不满，就找个理由雇了个人，反正要我出钱。

晓旅说，家里的一切事都由人家干。我不同意，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应该多做些家务事。不能说：人家拿了我们的钱，就要人家死给我们看。虽然在我来说，每天一元是个了不起的开支；但是在人家方面来说，一天一元钱也用不着卖命。不能要人家拿一块钱而干一元五的工作。

第二天，我把从工地上带回来的脏衣服拿出来。绍珠（新阿姨）要抢去洗，我不让。我说袜子、口罩、手帕之类的我自己能洗；难洗的大件头，如被单、外衣等拿到社内洗衣房去洗；只请她洗衬衣裤。晓旅不同意，说何必又要花钱呢？我说衣服上有很多油渍，没有汽油洗不下。她才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我洗了整整一个上午。绍珠也很忙，因为我离家两个星期，家里弄得一塌糊涂；书架

上满是灰，窗台、地板上也是一层灰，厨房里的器皿、碗筷、桌上的玻璃杯等等也都污秽不堪。可见晓旅和她的母亲一离开别人是无法生活的，这还是地主分子剥削别人劳动才能生活的寄生表现。绍珠忙了一上午才整顿干净。而她和她的母亲坐在房间里闲谈，听收音机，没来帮助我们一下。我真是生气。中午了，要打开水，绍珠又要去洗衣房洗衣服。可是人家刚来，不知开水房和洗衣房在何处。我请晓旅带人家去看一遍，她不肯，要我去。而我又忙着再（弄）衣服，走不开。我当时是说了一句硬话：享福不要享得过分了！她气冲冲地跑了出去，说：到门口去指一下就行了。并且说：不要以为到十三陵去劳动了几天就了不得！

午后三时，张连瑞带着她的八岁的儿子利利来玩。自从我犯了错误之后，没有任何人到我处拜访过。只有这种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才真正了解我。从1955年4月起，她就是我的大女儿青青的保姆，直到1957年夏晓旅生出了贝贝时才走。在1956年秋冬之间，她还把青青带回她的故乡密云县去过一次。他对青青以及对我均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儿子利利很乖巧，很听话，见了我和晓旅都鞠躬敬礼，并口称叔叔和阿姨。她以前的丈夫姓刘，对她们不好，在三、四年前离婚了。今年元旦，她和一位姓郭的同志结了婚。此人在第二印刷厂工作，宿舍就在新华社的后门口。郭同志有一位母亲，五十多岁，很健康，能做家务事。还有一个弟弟。在去年12月，她曾来玩过。我还说过：何时结婚？一定要告诉我。后来听杨仲琴说她结婚了，她也许因为我正处于困难之际，那我破费。这当然令人很感谢。但是我仍然觉得十分遗憾。

今天既来了，我当然要很好地招待她。我炸了咸鱼，晓旅炒了菠菜、鸡蛋，绍珠到厨房里去买了一个好菜。我又到合作社去买了红烧肉、猪头肉、口条、咸鸭蛋。春节时，杨仲琴说要来吃红烧肉，我煮好了二斤肥肉，还打了一瓶葡萄酒。等了两天，肉都发臭了，她也没来。在我临十三陵（2月21日）那天，由岳母卤煮吃了。但是一瓶酒还在，这次它也发挥作用了。酒杯不够，凳子也不够，我到闫君家去借了来，闫君问干什么，平淑说明了原因。我不知道他们是赞同我的为人呢，还是会讥笑我愚蠢呢？

去合作社买酒菜时，我顺便买了一件绿绒衣和一盒点心，因为我看利利身上穿得很单薄。至于点心，虽然他们来时，我已用茶水和把家里有的一切东西：糖果、瓜子、饼干、蛋糕、花生、酥饼等都拿出来招待了他们，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再带上一点吃的东西更好。

晚上，连瑞和我们送青青去幼儿园，青青哭着不进门，要跟连瑞阿姨走。这是青青第一次哭着不愿回园。真正的母亲的劳动比挂名的母亲得到孩子的多么深厚的感情啊！费了半天力气，园里的几个阿姨也都上来说好说歹的，才把青青哄住。就这样，连瑞和我们还是偷偷走掉的。

我送这母子俩走出大门。他们一再叫我止步我才停脚，目送他们慢慢走去。连瑞不时回头叫我回家，说风大天冷。我嘴里答应，可是心里不想走。利利也不时底回头喊，戴煌叔叔你回家吧！来往汽车的声音很响，可是我还是听得见这可爱的孩子的声音。我一直望着他们走过了第四根路灯杆，看不见影子，才慢慢地，回转身来。

58年3月29日 星期六

争取在下礼拜三晨 8:10 去密山。行李提前集中。第二天上午到哈尔滨。住下来（黑龙江分社）。第三天早上 7:50 慢车离哈，夜 3:58 到密山车站。走一里路到农垦局政治部接收站，由那里分配。

要准备：皮帽子、棉鞋、多穿棉衣棉大衣、被子要厚、准备住帐篷。要蚊帐、两衣、两鞋、手电；

要转户口及粮食关系，转到黑龙江省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带一个月通用粮票。

条件很艰苦，要有思想准备。

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播种、耕地、挖水沟。■

（高忆陵整理）

【资料】

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一封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编者的话：¹戴煌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现在已为揭露出来的许多材料所证明。在1956年11月间，他曾经准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在这封信里，他夸大事实捏造材料，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提出猖狂的挑战，这封信已经写了大约一万五千字。据他本人说，只是由于得知党内整风运动即将开始，他才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在这封“万言书”中，这个右派分子提出了他的系统的、全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把他自己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因为全文太长不能全部发表，现在我们将这份“万言书”中的一些观点按原话删节摘要发表，请同志们批判。

戴煌首先写道：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述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的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政府作何赞扬。应该被赞扬的无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并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

¹此为1957年8月12日新华社《前进》报编者按和戴煌《1957年万言书节选》。

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7月下旬，回到了我的故乡——苏北阜宁县沟圩镇。它给我的印象除了贫困和简陋，别无其它。

回家的第二天，家乡的父老亲友和党团员们就向我痛述地方干部的罪行。说干部们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沟圩本街的党支部和公安员黄正恭。

戴煌接着用了千余字描写了这个坏干部的恶行后说：这样，群众失望到顶点，他们说：“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那（哪）天得抬头？”有些老年人则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已过了几十年的牛马生活，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这一带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已被这群狼群狗党破坏到何种程度！

戴煌强调说，我所以将家乡的这一段事情不厌其烦地写在这里，是想向我们的领导者说明：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多么地远！长此下去，怎能保证不发生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可悲的事件呢？因为我们的敌人在欢迎和期待我们替他们制造机会呢！请不要认为我这是夸大其词，狂言乱语。全国每个角落，那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接着说：农村和其他城市如此，首都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令人满意。几年来，北京市的行政费用很大，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市政建设方面有何成就。在谈到去年工资改革问题时，戴煌说，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的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也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

没有谁来敢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如果这样正确地统计出来，我相信：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消费还要多得多！这难道是应该容忍的一种特别的“平等”吗？戴煌又说：数千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人们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奉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每一个角落。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争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不顾一切地命令争取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国家多少的财富。大肆吹嘘过的宝成路在刚刚通车后就断成了好几节是其中的一例。

今天，我们的各种建筑有那一样可以像长城、故宫那样地流传千年万代？就连众目睽睽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在尚未完工时就开始这里修，那里补，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这项“修不完”的工程。看来，要我们百年后的子孙再看到我们今天所创造的高楼大厦，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真正是为了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脚踏实地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的。

几年来，我们一张口就是“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过的事”。然而，就没有好好地想一想：我们今天有那（哪）一样能够像我国古代的指南针、火箭、造纸、印刷和陶瓷那样地在世界领先！我们今天能够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赶过了我们的祖

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长江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哩！

戴煌说：在我们国家里，有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亦会说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那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或错误不负有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自负要为英明的神吧。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党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也是人民代表，也是党代表，然而在新华社里，几乎是所有记者编辑对新华社领导者的墨守成规、没有远见、说得多而做得少以及官僚、不虚心、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以及不关心群众疾苦等等的毛病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这一切，中央负责同志怎能知道呢？有谁愿意了解这些下情呢？像这样地被选错的人恐怕不是一个吧？

以上种种意见的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的观察以及和若干同志的“谈心”所得而综合起来的。

既然有这样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给报纸呢；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

问题杂文（其精神在上面已提过了）。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篇稿件一起的，还有一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就是新闻报导方面的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问题了，我说由于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而感到羞愧。对于这封信的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正式稿件尚被投进废纸篓，对它的处理就可想而知了。它或许已被送到中宣部去了，或是送给新华社领导者了，也可能被送到公安部，把我当作一个政治嫌疑犯。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的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事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材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说道：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的和腐朽的则被偷偷地掩藏了起来，或者被巧妙地遮盖过去。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的而不讲好的，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均来个“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它们的锋芒是对着谁？是对的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到多少倍的事件以至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那（哪）里去讲呢？ ■

【资 料】

中共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¹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总政治部：

自反右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希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还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还是适当的。但也有划多了或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行到深入阶段，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宽了一些，以致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重视。不论多划了或少划了都应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和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头的错误认识和印象。

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做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又有悔改，脱掉他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其他

¹ 此文件为戴煌 1970 年代在山西太原劳改营时抄录。原载山西控诉资产阶级专政联络站。

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划分的标准。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附：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漏记）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革命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与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小集团，蓄意推翻某一部部门或者某一

基层单位的共产党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 1、右派活动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当批判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有认识自动检查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的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且历史上一贯不反党、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或者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并未积极宣扬，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出，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附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蒙蔽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介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尚未检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付他们。

（原载山西控诉资产阶级专政联络站）

此件由于多次转抄，难免有遗漏，仅供参考，以正式文件为准。¹■

【资 料】

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右派问题的两个文件²

中发 1978 第 11 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1957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毛主席曾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从1959年至1964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期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

中共中央

1978年4月5日

¹ 原抄录者戴煌注

² 戴煌在上访过程中手抄文件

【资 料】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胜利地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目前大好形势下，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7 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粉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四十五万，并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先后五批摘掉约卅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十万多名。他们经过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新罪行的人只是极少数，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分子的胜利。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掉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分散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有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 1975 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多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我们以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作法：

（一）右派分子摘帽工作，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在收到中央的文件以后，应向本单位群众讲解中央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意义，宣传党的政策，然后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名单向本单位群众公布，报上一级党委备案。

（二）对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分子对待。

（三）对于已经死亡的右派分子，为了争取教育其家属子女，也应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

二、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问题：

（一）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

（二）对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做退休退职处理，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负责安置。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以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

（三）现在仍在劳教场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

（四）原属起义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五）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无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到军队。

（六）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入党、入团、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不应受到影响。

（七）对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

（八）遵照中央1962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

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三、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措施，各级党组织应予以重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组织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子的有关事宜，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上述工作。

为了解决摘帽以后的许多具体问题，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开一次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专业工作会议，商定具体实施方案，以便统一贯彻执行。

为了解决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的安置问题，建议国家计委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调拨必要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由新华社统一发表消息。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1978年4月4日¹

（此为戴煌当年上访过程中抄录的）

【资 料】

中发 1978 第 55 号

（发至县、团，传达到公社党委）

（大意是）²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 1978

¹ 此件为戴煌在上访过程中抄录

² 此文件戴煌抄得比较匆忙

年8月5日呈报的《贯彻关于中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望各级党委贯彻执行。

摘帽以后要做好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件大事，这部分人中有不少有用之才，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出路，发挥所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望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作好这项工作。

1978年9月17日

五部委报告前言从略¹，方案主要内容：关于安置问题：

1. 原保留公职的人，要给予适当安排，有专长的要发挥其专长，不能工作的要做退休处理。

工资级别一般不动，低的可适当调整。须退休的，按工龄计算。

2、开除公职的如有实际困难，应准予回城市落户，安排就业。

3、在劳教单位的，应安置就业，按国家职工对待。

4、原高等院校学生，要根据其专长，分配工作。

5、安置编制名额与指标，由省与国家解决。

6、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统一领导，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办理。

若干政策问题：

1、摘帽后不再叫“右派”，与其他正常人员一样待遇。

2、家属子女不受影响，要看本人政治表现。（以下从略）

（3至10是不受影响的具体规定，从略）²

¹ 手抄件，不完整。

² 原抄录者手迹如此。

关于改正问题

按照中央 1978 年 11 号文件精神 and 1957 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但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1957 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 1957 年中央的规定办理。凡符合中央的规定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意义。

对要求改正的申诉，由申诉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受理，转交原划右派单位处理。原单位应认真调查研究，作出结论。原单位已撤销，由申诉人现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负责处理。改正结论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受理和审批单位对申诉案件都要认真负责，抓紧处理。

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

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加强党委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五部委署名

1978 年 8 月 25 日¹

¹ 上述三份手抄文件录入：潘祛病。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 潘祛病 韦陀

本期封面： 贺真真

本期版式： 续霜红